

羅振玉與王國維詞曲研究之學術因緣*

梁帥**

摘要

在二十世紀的學術史上，學界有關王國維與羅振玉學術聯繫的考察，多是從金石、甲骨文等領域起步，而詞曲才是二人學術結緣的起點。時至清末，羅振玉不僅將所藏詞曲借予、相贈予王國維，而且對王國維詞曲著述的出版竭力提供幫助。旅日之後，雖然王國維漸漸將學術興趣調整出詞曲，但是羅振玉時常與王國維圍繞詞曲版本、作家史實等問題進行討論，其在刊印詞曲書籍時亦多有請教王國維。王國維還將自己的詞曲書目借予羅振玉，由後者編入大雲書庫藏書目錄中。王國維去世後，羅振玉、羅振常分批將王國維舊藏詞曲悉數賣予海內外藏家。梳理羅振玉與王國維詞曲研究之關係，這對於理清二人的學術聯繫，考察王國維詞曲研究活動的開展，乃至窺探民國時期的學人生態，都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王國維、羅振玉、詞曲校勘、著述出版、《王靜安手錄詞曲書目》、王國維舊藏詞曲

* 本文是 2020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清代宗室戲曲活動研究」之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0CZW016），並得到 2024 年度河南省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創新人才支持計畫資助「中國近現代社會轉型與河南戲劇的變革」支持。本文承三位匿名審查先生惠賜卓見，以助修訂，謹此謝忱。

** 鄭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一、前言

學術界一談起王國維（1877-1927）的學術交遊，就會很自然地首先想起羅振玉（1866-1940）。王國維早年沉潛於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等人的西洋哲學當中，並於詩詞創作多有會心之所。然而三十歲之後，他自覺於哲學「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的苦悶，¹遂轉治古典詞曲，所著《人間詞話》、《宋元戲曲考》等書，藝林歎為大觀。宣統三年（1911）底，王國維與羅振玉、劉大紳（1887-1954）一同赴東瀛避難。至《宋元戲曲考》完成，他又將研究轉至經史、小學等領域。關於此次轉向，羅振玉講到：「予乃勸公專研國學，而先於小學訓詁植其基。……公聞而悚然，自懟以前所學未醇，乃取行篋《靜安文集》百餘冊悉摧燒之。……公既居海東，乃盡棄所學，而寢饋於往歲予所贈諸家之書。」²王國維的此番學術調整當與羅振玉的從中引導不無關係。加之現今保存下來的王國維與羅振玉近一千封書信，主要是集中在1913年之後，因此二人關於金石、甲骨文與音韻等方面的學術探討便得以豐富且細緻地記錄下來，學界也關注得較多。³

¹ 王國維，〈三十自序〉，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卷14，頁121。

² 羅振玉，〈海寧王忠愍公傳〉，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卷20，頁228-229。

³ 郭沫若（1892-1978）《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顧頡剛（1893-1980）《當代中國史學》即圍繞羅振玉、王國維於甲骨領域的學術聯繫多有討論，張舜微（1911-1992）〈王國維與羅振玉在學術研究上的關係〉也全面梳理了二人的學術交往，不過仍然集中在經史領域。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上海：新新書店，1930年）；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南京：南京勝利出版社，1947年）；張舜微，〈王國維與羅振玉在學術研究上的關係〉，收入吳澤主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輯1，頁410-419。

然而回顧王國維的詞曲研究，得益於羅振玉幫助的地方著實也有不少。雖然羅振玉治學重經、史，並不精通詞曲版本，亦無搜集、刊印詞曲舊籍的志趣。不過詳考王國維所藏詞曲，或有直接源自羅振玉的贈予，或是羅振玉從中聯絡才得以獲取。在《曲錄》、《戲曲考原》等著作的出版過程中，乃至靜安下世後的詞曲遺稿整理，羅振玉同樣多有出力。旅日之後，王國維同羅振玉也時有探討詞曲。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 1912 年底，王國維還將舊藏詞曲書籍的目錄交付羅振玉，由其編入羅氏私人的大雲書庫藏書目錄中。旅日期間王國維更是將所藏詞曲轉於羅振玉，此後王國維舊藏詞曲的售賣、流傳便多與羅家有密切關係。詞曲儼然成為聯繫王國維與羅振玉的重要學術紐帶，羅振玉於王國維詞曲研究的特殊意義需要被重新確立並審視。

羅振玉，祖籍浙江上虞，生於江蘇淮安，字叔蘊、叔言，號雪堂、永豐鄉人，晚號貞松老人，藏書樓有唐風樓、大雲書庫等。甲午國變後，羅振玉在上海創立農學社、東文學社，王國維即是在此求學期間與其相識。光緒三十二年（1906）羅振玉奉調學部參事，王國維得其舉薦北上至學部任職，在圖書編譯局擔任編輯。直至宣統三年（1911）底，羅振玉、王國維同赴東瀛。在清末的這段時間內，王國維緊緊跟隨著羅振玉，要說他們在朝夕相伴時從未涉獵詞曲，這著實不太可能。到日之後，兩人更是多有討論詞曲；如《元刊雜劇三十種》的發現便是在此時，羅振玉從文求堂書店購得後首先交付王國維使用，之後京都大學又請陶子麟（1857-1928）覆刻，遂得以嘉惠學林。

羅振玉的治學本與王國維就是殊途，當王國維專注於西洋哲學時，他早早地就確立了以經史為基礎的治學門徑：「若就先生治學之根柢門徑言之，其發軔之始，大體仍在經史也。……先生在中年時……其尤為世界所注重者，凡有三事：即殷虛甲骨、西陲木簡、敦煌石室

佚書是也。」⁴ 羅振玉還屢有勸勉王國維調整治學方向，然其並未即刻聽從：「公雖加流覽，然方治東西洋學術，未遑專力於此。」⁵ 不過在王國維「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⁶ 並率先將詞學確立為文史研究的對象後，唐風樓中的詞曲書籍便首先成為可以供其隨意翻檢的文獻，二人的學術聯絡由此正式建立。王國維曾提到自己在羅振玉處看到多部珍稀詞籍，如朱彝尊（1629-1709）舊藏明顧梧芳（?-?）刻《尊前集》上卷、嘉靖末安肅荆聚（?-?）刊本《草堂詩餘》、明覆刊宋本《花間集》等，這些書對王國維的相關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版本支持，直接影響到相關觀點、著述的撰寫。

二人詞曲研究機緣的確立還表現在正是羅振玉的牽線提引，王國維到京後不久便得以結識吳昌綬（1856-1924）、劉世珩（1874-1926）、董康（1867-1947）、繆荃孫（1844-1919）等學人，後者在詞籍校勘、文獻搜述等方面對王國維的詞曲研究有著直接影響。彼時繆荃孫任學部圖書館正監督，吳昌綬出任內閣中書，劉世珩擔任度支部右參議，董康為大理院推丞。幾人中當屬王國維資歷最淺，到京任職最晚，他們得以同王國維結識並相交，蓋是起於羅振玉的從中聯繫。誠然，王國維研治詞曲方法的確立首先與其自身的學術領悟密不可分，但這也同以羅振玉為核心，繆荃孫、吳昌綬、劉世珩等繼承乾嘉學脈學者們的起導鼓勵不無關係，他們為王國維迅速地從西方哲學轉向傳統文史提供了外部環境。此後王國維在從事詞曲研究時，從他們身上得到的惠澤其實是很多的。

回顧學界既往之研究成果，彭玉平《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第四編「學術因緣論」較早關注王國維與沈曾植（1850-1922）、吳昌綬

⁴ 柯昌泗，〈弔上虞羅先生〉，收入羅繼祖主編，《羅振玉學術論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冊12，頁319-320。

⁵ 羅振玉，〈海寧王忠愍公傳〉，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卷20，頁228。

⁶ 王國維，〈三十自序〉，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卷14，頁121。

等八位同時期學人的學術聯絡，這也是誘發筆者撰寫本文的直接動機。然彭氏在論及羅振玉與王國維的學緣關係時，只關注到二者在詩學思想上的關聯異同，並未涉詞曲。僅就詞曲研究而言，日本各大公私圖書館所藏王國維舊藏詞曲，在學界的已有研究中佔據著基礎性地位。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日本學者榎一雄（1913-1989）〈王國維手抄手校詞曲書二十五種〉率先披露東洋文庫所藏王國維舊藏詞曲；近年來，余筠珺〈王國維早期研治詞學歷程考述——兼論東洋文庫所藏鈔校本詞籍之價值〉以這批文獻為核心，梳理了王國維的詞輯校勘活動。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這一階段，黃仕忠屢次赴東瀛訪書，所編《日藏中國戲曲文獻綜錄》詳細披露了包括東洋文庫在內的日本公私機構所購王國維舊藏戲曲。東洋文庫是 1927 年經文求堂書店斡旋，從羅振玉、羅振常（1875-1942）處買得；羅振玉則是在旅日期間得自王國維的相贈，後者在 1916 年春回國之前又從大雲書庫取出若干經史書籍，因而二人的書籍交換也成為學界關注焦點。黃仕忠〈王國維舊藏善本詞曲書籍的歸屬〉、黃仕忠與徐巧越合撰〈王國維所編《羅振玉藏書目錄》原本及羅王互贈藏書考〉，便就羅振玉在王國維舊藏詞曲書籍的流轉、售賣過程中的實際作用進行了考察。不過如前文所言，學界多將目光聚焦在日本所藏文獻，而於中國大陸、台灣所藏王國維舊藏詞曲關注得很少，這不僅不利於全面梳理王國維的詞曲活動，更容易形成一葉障目的遺憾。此外以本文為切入點，學界部分已有成果還有可商榷處，如王國維對陳毅（1873-1928）所藏《錄鬼簿》版本的判斷、蟬隱廬與王國維舊藏詞曲的出售等。⁷ 簡而言之，以羅

⁷ 彭玉平，《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日〕榎一雄，〈王國維手抄手校詞曲書二十五種〉，收入吳澤主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 年），輯 3，頁 313-338；余筠珺，〈王國維早期研治詞學歷程考述——兼論東洋文庫所藏鈔校本詞籍之價值〉，《臺大中文學報》第 60 期（2018 年 3 月），頁 147-191；黃仕忠，《日藏中國戲曲文獻綜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黃仕忠，〈王國維舊藏善本詞曲書籍的歸屬〉，《海內外中國戲劇史家自選集·黃仕忠卷》

振玉、王國維詞曲聯繫為中心，不僅可以真切感知羅振玉、王國維間的臻純情誼，還可以細緻呈現二人的早期學術往還，並以此為基礎窺探民國時期的學人生態。

二、羅振玉藏書與王國維的詞曲校勘

王國維研治詞曲尤注重文獻，談及《宋元戲曲考》的編寫心得，他便講到：「凡諸材料，皆余所蒐集；其所說明，亦大抵余之所創獲也。」⁸ 羅振玉的手中就有不少詞曲善本，它們豐富了王國維對詞曲文獻的掌握。

如《草堂詩餘》一書，王國維藏有三種，羅振玉手邊也有一部：「余所見此書，別本獨多：一、嘉靖庚戌顧從敬刊本；一、嘉靖末安肅荊聚刊本；一、萬曆李廷機刊本；一、嘉靖己酉李謹刊本，即此本也。荊聚本在唐風樓羅氏，餘三本均在敝篋。」⁹ 羅振玉所藏荊聚本《草堂詩餘》為此後王國維判定《雍熙樂府》的版本、考訂作者提供了依據。光緒三十四年（1908）王國維在書肆購得明楚藩原刻本《雍熙樂府》，後考證此書曾經三次刻印：「第一次刻本刊於嘉靖辛卯，即此刻祖本，《提要》所謂舊本題海西廣氏編者也。第二次刻於嘉靖庚子，有楚愍王顯榕序。第三次則嘉靖丙寅本，有安肅春山序，錢唐

（鄭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頁389-398；黃仕忠、徐巧越，〈王國維所編《羅振玉藏書目錄》原本及羅王互贈藏書考〉，《文獻》2019年第5期（2019年9月），頁181-191。此外，與本課題有關之成果還有：李家橋，〈王國維抄校《錄鬼簿》考〉，《文獻》2021年第2期（2021年3月），頁152-166；王鋼，〈《錄鬼簿》校訂〉（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梁帥，〈王國維《曲錄》考論〉，《臺大中文學報》第73期（2021年6月），頁177-276。

⁸ 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序〉，收入中國戲劇出版社編，《王國維戲曲論文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年），頁3。

⁹ 王國維，〈庚辛之間讀書記〉，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卷2，頁447。

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著錄者是也。」¹⁰ 第二年他又獲讀日本毛利侯（?-?）《草月樓書目》，進而得知《雍熙樂府》為明人郭勛（?-?）所編：「宣統改元冬十月，見日本毛利侯《草月書目》，有《雍熙樂府》十六卷，明郭勛編。」¹¹ 此書同樣是得於唐風樓，《羅氏藏書目》善本部著錄：「《草月樓目》四卷，鈔本，三本，日本無名氏。」¹² 王國維於是回憶起早先所見荊聚刊本《草堂詩餘》：「又見明嘉靖本《艸堂詩餘》，末一行曰：『安肅荊聚校刊』，下有印記曰『春山居士』，則春山乃荊聚別字。」¹³ 郭勛，字荊聚，別署春山居士，安肅人，在王國維的考證下浮出水面。王國維對郭勛的認識，蓋是得於羅振玉所藏《草堂詩餘》與《草月樓書目》。

宣統三年（1911）王國維作〈《花間集》跋〉，此書為「明覆刊宋本。前有蜀廣政三年武德軍節度判官歐陽炯《序》，後有紹興十八年濟陽晁謙之《跋》」。¹⁴ 早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王國維編寫《詞錄》時，他僅獲見明末毛晉（1599-1659）汲古閣《詞苑英華》刻南宋陸游（1125-1210）跋本、光緒十四年（1888）徐幹（?-?）《邵武徐氏叢書（二集）》覆刻宋紹興晁以道（1059-1129）本，以及王鵬運（1849-1904）四印齋翻刻鄂州公使庫刻本。對於這部明覆宋刊本，王國維並未獲讀，他此次所見便是羅振玉所藏明正德十六年（1521）吳郡陸元大（?-?）刻本。羅振玉在此書跋語中指出「邵武徐氏謂此為宋刻，以此本證之，其楮墨皆似明本，殆是明人翻雕，然宛然宋槧之舊」，¹⁵ 王國維亦將該書定為明覆刊宋本。此版本《花間集》也引起

¹⁰ 王國維，〈《雍熙樂府》跋〉，收入中國戲劇出版社編，《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367。

¹¹ 王國維，〈《雍熙樂府》跋〉，收入中國戲劇出版社編，《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367。

¹² 羅振玉、王國維編，《羅氏藏書目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下冊，頁169。

¹³ 王國維，〈《雍熙樂府》跋〉，收入中國戲劇出版社編，《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367。

¹⁴ 王國維，《花間集》，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卷2，頁443。

¹⁵ 羅振玉，《花間集十卷》，《大雲書庫藏書題識》，卷4，收入羅繼祖主編，《羅振玉學術論著集》，冊7，頁355。

了詞學界關注，它後來被借予吳昌綬：「昔吳印臣刻宋元詞，即依此本開雕。」¹⁶ 即《景刊宋金元明本詞》所收本。羅振玉早先曾有意「取臨桂王氏本、毛本，與此一對勘之，俾成完善之本」，¹⁷ 然卻遲遲未見進行。至 1922 年一月，王國維借羅氏藏本校以《四部叢刊》本《花間集》：「辛酉十二月望日，以明景宋刊本校。」¹⁸ 此書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通覽王國維的批校，首先是玄覽齋本與陸元大本的分卷不同，他遂在《四部叢刊》中依陸元大本進行說明。其次校正底本中的訛誤。如薛昭蘊（？-？）《小重山》，王國維補記：「『愁極』作『愁起』，『遶階』作『遶宮』，非是，合縱舊本。宋本有此小注。」¹⁹ 張泌（約 930-？）《浣溪沙》，《四部叢刊》本作「絕花淹竹小溪流」，王國維改為「照花淹竹小溪流」。²⁰ 顧穹（？-？）《浣溪沙》，王國維在眉批記：「舊前作『天際鴻，枕上夢，兩牽情』，後作『小窗深，孤燭背，淚縱橫』，景宋本有此注」。²¹ 且在文末，王國維又將陸元大刻本中的晁謙之（1090-1154）跋逐錄於《四部叢刊》本後。

羅振玉也每每將所藏詞曲借予王國維抄錄。光緒三十四年（1908）夏，王國維在羅振玉處得見萬曆顧梧芳刻《尊前集》：「（明顧梧芳刻《尊前集》二卷）光緒戊申仲夏，借叔蘊先生竹垞藏本，跋而歸之。」²² 此書原為朱彝尊舊物，王國維在書後撰有三道跋語詳考

¹⁶ 張爾田，〈《花間集》跋〉，收入〔五代〕趙崇祚編，《花間集》（四川圖書館藏正德十六年〔1521〕吳郡陸元大刻本）。

¹⁷ 羅振玉，《花間集十集》，《大雲書庫藏書題識》，卷 4，收入羅繼祖主編，《羅振玉學術論著集》，冊 7，頁 355。

¹⁸ 王國維評，〔五代〕趙崇祚編，《花間集》（據國家圖書館藏《四部叢刊》明萬曆三十年〔1602〕玄覽齋本影印），卷 4，頁 5 上。

¹⁹ 王國維評，〔五代〕趙崇祚編，《花間集》，卷 4，頁 5 上。

²⁰ 王國維評，〔五代〕趙崇祚編，《花間集》，卷 5，頁 3 下。

²¹ 王國維評，〔五代〕趙崇祚編，《花間集》，卷 8，頁 6 上。

²² 王國維，《明刻尊前集殘本》，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卷 14，頁 528。

此書之版本，並認為「此書雖非梧芳自編，亦非復呂鵬所編之舊」。²³ 之後王國維將其影鈔，惜該書缺少下卷，他使用毛晉《詞苑英華》本抄配：「唐風樓藏有朱竹垞藏明顧梧芳原刊《尊前集》，精雅之至，因影鈔一過。惜缺下卷，以汲古閣刻《古刻詞苑英華》本補之。」²⁴ 儘管彼時羅振玉所藏顧梧芳刻《尊前集》為殘卷，²⁵ 但他仍期求完帙；最終該書下卷也為羅氏覓得，此書今亦藏中國國家圖書館。²⁶ 據書中所鈐「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長樂鄭氏藏書之印」判斷，²⁷ 下卷後又為鄭振鐸（1898-1958）購去。從〈《明刻尊前集殘本》跋〉判斷，王國維還持有《詞苑英華》本《尊前集》，但王國維對版本的選擇、古籍校勘有著特別講究：「校勘雖只是研究學問的一種手段，但其自身卻是極精密而富有科學性的工作，涉獵不廣，校閱不精，便不能辨誤顯真。」²⁸ 因而他日後多有使用影鈔本《尊前集》，而非《詞苑英華》本。《靜庵藏書目》、《王靜安手錄詞曲書目》著錄的《尊前集》也為此版本：「《尊前集》二卷，影寫明顧梧芳刊本，二本。」²⁹ 光緒三十四年（1908）夏王國維輯錄《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所據主要書籍便有此；《詞錄》所撰《尊前集》提要亦是襲自〈《明刻尊前集殘本》跋〉，足見該書在王國維詞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羅振玉還常常代王國維尋覓詞曲善本珍槧。宣統元年（1909）《曲錄》完稿後，王國維有意於重校《錄鬼簿》，而彼時他手中只有兩部

²³ 王國維，〈《明刻尊前集殘本》〉，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卷14，頁528。

²⁴ 〔日〕榎一雄，〈王國維手抄手校詞曲書二十五種〉，收入吳澤主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輯3，頁330。

²⁵ 羅振玉藏《尊前集》上卷今歸中國國家圖書館，索書號：19679。

²⁶ 〔宋〕佚名編，《尊前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年〔1582〕顧梧芳刻本）。

²⁷ 〔明〕顧梧芳，《尊前集》（國家圖書館藏明刊本）。

²⁸ 王國維，〈王國維致劉世珩〉，收入房鑫亮編，《王國維書信日記》（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頁31。

²⁹ 王國維，《王靜安手錄詞曲書目》（四川省圖書館藏民國稿本）。

校本，即陳毅所藏鈔本的過錄本，及曹寅（1658-1712）棟亭十二種本。之後羅振玉便向繆荃孫借得所藏尤貞起（?-?）鈔本：「王君靜安（即著《曲話》者）。擬刻《錄鬼簿》，前於陳士可處借得明鈔本，已校於曹刻之上，尚求賜錄鄴架所藏本，以便會校成一善本，想長者當鑒許也。」³⁰不久繆荃孫即將此書寄與羅振玉：「發羅叔蘊信，寄《錄鬼簿》。」³¹又是在本年，汪康年（1860-1911）向羅振玉去信提及自己藏有支豐宜（1800-1875）《曲目表》，這著實令羅振玉頗為驚訝：「錢某溪《曲目表》，不僅靜安，弟亦未見也。」很快，汪康年便將《曲目表》經羅振玉轉交給王國維：「《曲表》收到，即示靜安。」³²羅振玉良好人脈資源為王國維的詞曲研究提供了諸多便利，使其得以順利獲讀珍稀秘笈，直接促進了王國維詞曲研究的精進。

羅振玉更有將所藏詞曲贈予王國維者。王國維藏有三部《梅苑》，一部棟亭十二種本、兩部淮南宣氏刊本（分別為兩冊與四冊）。宣統元年（1909）二月，王國維率先得到了兩冊的淮南宣氏刊本《梅苑》，它便是羅振玉贈予：「《梅苑》素無刻本，唯棟亭十二種中，始一刻之。此係淮南宣氏據曹本重刻，別存先生出以見贈。」³³又在本月，王國維再得棟亭本《梅苑》：「宣統改元閏二月，唐風樓主人贈余以淮南宣氏所刻《梅苑》。不旬日又得此本（梁案，即「棟亭十二種本」）。」一月之內兩得《梅苑》，這使王氏「歡喜無量」。³⁴至本

³⁰ 羅振玉，〈羅振玉致繆荃孫〉，收入錢伯城、郭群一整理，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頁1245。

³¹ 繆荃孫著，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卷3，頁95。

³² 以上引文，見羅振玉，〈羅振玉致汪康年〉，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劄》（上海：上海書店，2017年），頁2921、2924。

³³ 〔日〕榎一雄，〈王國維手抄手校詞曲書二十五種〉，收入吳澤主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輯3，頁331。

³⁴ 〔日〕榎一雄，〈王國維手抄手校詞曲書二十五種〉，收入吳澤主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輯3，頁330。

年九月，王國維從《梅苑》中輯得《孤雁兒（並序）》，後補入四印齋刻李清照（1084-1155）《漱玉詞》中：「閱《梅苑》，又補得一首，不知夔生何以遺之。」³⁵ 早年的王國維還在羅振玉處見到三種朱有燉（1379-1439）所撰雜劇：「上虞羅氏所藏《洛陽風月牡丹仙》《十美人慶賞牡丹園》《天香圃牡丹品》三種。」³⁶ 此書曾經劉履芬（1827-1879）紅梅閣遞藏，清末歸入羅振玉，羅氏後將此書讓於王國維。至1927年，羅振常蟬隱廬書店又據此本影印，題為「明周憲王樂府三種」，在售賣時羅振常特意提及此書之底本曾經王國維藏持：「《周憲王雜劇三種》，明周憲王有燉撰，宣德刊本，江山劉氏、海甯王氏藏書，蟬隱廬影印白紙。二冊，一元。」³⁷ 羅振玉的志向並不在詞曲，因而此類書籍於其而言價值有限，但對於王國維卻幫助頗大。

基於上述考察，可知自光緒三十四年（1908）始，由於唐風樓藏有多部詞曲，羅振玉便向王國維的研究提供了文獻支持。相較於詞籍，羅振玉處所藏曲類並不多。多年後的羅莊（1896-1941）也提及大雲樓藏書中「經部經說、小學之書重本甚多，而集部中詞曲竟無一種」，³⁸ 這大概是指羅振玉的藏書中戲曲類較少，而詞類倒是有一些。

三、羅振玉與王國維詞曲著述的整理出版

關於王國維的性格，好友馬衡（1881-1955）曾有回憶：「他平生

³⁵ 陳鴻祥，〈《人間校詞笥記十三種》零笥〉，《文教資料》1989年第1期（1989年1月），頁45。

³⁶ 王國維，〈《雜劇十段錦》跋〉，收入中國戲劇出版社編，《王國維戲曲論文集》，頁363。

³⁷ 羅振常，《蟬隱廬新版書目》（民國十九年〔1930〕鉛印本第五期），收入徐蜀、宋安莉編，《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冊26，頁341。此材料得南京師範大學碩士研究生閃滌凡女士代為複印，特此致謝。

³⁸ 羅莊評，〔元〕鍾嗣成，《錄鬼簿》，收入《人間校詞笥記十三種》（上海蟬隱廬刊本），轉引自陳鴻祥，《王國維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19年），頁205。

的交遊很少，而且沈默寡言，見了不甚相熟的朋友，是不願意多說話的，所以有許多的人都以為他是個孤僻冷酷的人。」³⁹ 與王國維共事多年的袁嘉穀（1872-1937）也有相近描述：「靜安性情實在特別，當他在我下面做事的時候，自入局之日定一個坐位，每日祇見他坐在他的一個坐位上，永不離開。」⁴⁰ 說「簡默」、「木雞」是民國學人對王國維的初步印象，這當是不為過的。

與之相反，羅振玉則是財力、人脈兼具。他不僅能獲見尋常不得見之善本秘笈，更能在書籍出版、經費籌措等方面為王國維提供幫助。尤其是從後者角度來講，劉世珩、吳昌綬等也不能與羅振玉相比。趙萬里（1905-1980）《王靜安先生年譜》：「貴池劉聚卿（世珩）仁和吳耘存（昌綬）亦常與先生往返論學。二君好聚書，時有資異聞於先生。」⁴¹ 劉、吳二人長期致力於詞曲，他們在詞曲版本的支持、觀點闡釋等方面對《詞錄》、《人間詞話》、《曲錄》等有著直接影響。相較於他們，羅振玉則在王國維詞曲著述的整理出版方面貢獻突出。

（一）《晨風閣叢書》所收《曲錄》、《戲曲考原》

王國維詞曲著述的出版類型大體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連載於報刊雜誌者，如《優語錄》、《唐宋大曲考》、《錄曲餘談》載於鄧實（1877-1951）主辦的《國粹學報》，《古劇腳色考》發表在羅振玉主編的《國學叢刊》上。它們篇幅短小，偏於考證。一類是以著作形式刊發，如《曲錄》、《戲曲考原》、《錄鬼簿》、《唐五代二十一家

³⁹ 殷南，〈我所知道的王靜安先生〉，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卷20，頁265。

⁴⁰ 袁嘉穀，〈我在學部圖書館所遇之王靜安〉，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卷20，頁331。

⁴¹ 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編，《國學論叢》第1卷第3號（民國十七年〔1928〕年4月），頁93。

詞輯》。與之相近，還有一類先在報刊雜誌連載後結集成冊，《人間詞話》、《宋元戲曲考》便是如此。後兩者在體量、價值上均勝於前者，系統性更強，因而倍受學界矚目。

《晨風閣叢書》（下文簡稱《叢書》）所收《曲錄》、《戲曲考原》，是王國維的既往著述第一次以單行本形式發行，其意義自不言而喻。而從《曲錄》初稿的擬定到最終付梓，羅振玉就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曲錄》初稿本完成後，羅振玉曾請繆荃孫、劉世珩為王國維校讀、刊印。趙萬里提及：「《曲錄》六卷，此書曾刊入《晨風閣叢書》，其初稿為繆藝風假抄，陳君乃乾即據以印入其所輯《曲苑》中。」⁴²

《繆荃孫日記》中也確有藝風老人校讀《曲錄》的記載：「八月二十日，接《曲錄》、《曲品》」、「十月十一日，校《曲錄》」、「十月十二日，校《曲錄》畢」。⁴³ 繆荃孫是從羅振玉處得到的《曲錄》，因為在之後羅振玉代王國維向繆荃孫尋求尤貞起鈔本《錄鬼簿》時，羅氏特意提及「王君靜安，（即著《曲話》者）」，⁴⁴《曲話》當為《曲錄》筆誤。經過繆荃孫刪改後的《曲錄》被發與劉世珩，繆氏僅用時兩日就校讀完成的《曲錄》，便是學界長期以來未曾關注的劉世珩「玉海堂鈔本」《曲錄》，此書今藏上海圖書館。

玉海堂鈔本《曲錄》，凡兩卷，索書號：線普 465657-58。全書謄錄在外印有「玉海堂鈔書」字樣的綠色欄絲稿紙上，半葉 10 行，行 21 字左右。書中鈐有「畏齋藏書」、「公魯讀曲」、「楊景霖藏」朱文方印，以及「嘉蔭軒」朱文長方印。在「玉海堂鈔本」《曲錄》

⁴² 趙萬里，〈王靜安先生著述目錄〉，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編，《國學論叢》第 1 卷第 3 號（民國十七年〔1928〕年 4 月），頁 141。

⁴³ 繆荃孫著，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日記》，卷 3，頁 45、53、54。

⁴⁴ 羅振玉，〈羅振玉致繆荃孫〉，收入錢伯城、郭群一整理，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笥》，頁 1245。

卷下開篇還有劉世珩所撰識語：

《曲錄》二卷，假自羅叔蘊學部，為王靜庵校正。底本倩陳叔美照錄，老魏線裱。光緒戊申十月初五記，蔥石所鈔書。⁴⁵

「畏齋藏書」、「公魯讀曲」是劉世珩子劉之泗（1900-1937）的寶印。劉之泗，字公魯，受父親影響亦愛收藏戲曲；世珩死後，之泗繼承了其父藏書，並將藏書室命名為「畏齋」。「老魏」是玉海棠刻工魏小溪（?-?）：「魏小溪，亦陶子麟之夥友，黃岡人，在劉聚卿處影寫宋版書。」⁴⁶跋語言及《曲錄》應羅振玉邀請為王國維校正，擬由陳叔美（?-?）謄寫、魏小溪上板。但可能是王國維察覺到了初稿的粗疏，便放棄了原先的出版計劃，《曲錄》正式刊印被推遲到了一年後的《叢書》中。

《叢書》由沈宗畸（1857-1926）負責編輯，共整理古籍二十二種，其中刻本二種、鈔本十四種、新校本兩種與稿本四種。儘管自編刊之日起沈氏便以「提命風騷、表章絕學」為宗旨徵求時賢來稿和名家遺稿，⁴⁷但書中所刊文稿基本是由羅振玉提供。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記有「時羅先生為番禺沈太侔（宗畸）校刻《晨風閣叢書》」，⁴⁸文求堂所編售書目錄更是長期將此書標為「《晨風閣叢書》，羅振玉編」，⁴⁹足見羅振玉在《叢書》編纂、出版過程中的作用。

⁴⁵ 王國維，《曲錄》（光緒三十四年〔1908〕玉海棠抄本）。

⁴⁶ 劉承幹，《求恕齋日記（全十八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冊6，頁428。

⁴⁷ 夏仁虎，〈《國學萃編》緣起序〉，《國學萃編》第1卷第1期（光緒三十四年〔1908〕2月），收入姜亞莎等主編，《中國早期國學期刊彙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製中心，2007年），冊1，頁15。

⁴⁸ 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編，《國學論叢》第1卷第3號（民國十七年〔1928〕年4月），頁92。

⁴⁹ 〔日〕田中慶太郎編，《文求堂書目》（日本昭和三年〔1928〕十一月鉛印本），收入〔日〕田中慶太郎編，〔日〕高田時雄、劉玉才整理，《文求堂書目》（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此番晨風閣刊印的四部稿本分別為江瀚（1857-1935）《詩經四家異文考》、羅振玉《昭陵碑錄》以及王國維的《曲錄》與《戲曲考原》。除羅、王二人的著作外，江瀚所著得以出版亦是得於羅振玉的從中協調。江瀚，字叔海，號石翁，近代著名學者、教育家；自光緒三十二年（1907）起，江瀚便與羅振玉同在學部任職。宣統元年（1909）三月，羅振玉建議江瀚將所著《詩經四家異文考》交給自己出版：「作一箋與叔韞，擬排印鄙撰，托代問價。」半年後，羅振玉便將《叢書》交付：「叔蘊送《詩經異文考補》來。」⁵⁰

《南唐二主詞》、《平園近體樂府》、《後村別調》是王國維的校本，朱學勤（1823-1875）《結一廬書目》則經吳昌綬親筆校訂。⁵¹

《叢書》所收鈔本多數是出自唐風樓所藏。《〈《說文解字》校勘記〉殘稿》、《西域水道記校補》、《寒山金石林部目》、《滂喜齋宋元本書目》與《鹿門集》，據蔣斧（1866-1911）、沈宗畸所撰跋語講，皆為羅振玉舊物。⁵² 此外，京都大學藏《羅氏藏書目錄》是羅振玉、王國維赴日後編訂的藏書目錄。善本部分著錄的鈔本《明仁宗聖政記》、《出圍城記》、《潛采堂書目四種》、《方叔淵遺稿》、

2015年），冊7，頁378。

⁵⁰ 以上引文，見江瀚著，鄭園整理，《江瀚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年），頁300、322。

⁵¹ 吳昌綬致繆荃孫：「沈刻《結一廬書目》，即綬所刪削，尚未愜心。王靜安取去代刻。」朱學勤編，吳昌綬批校，《結一廬書目》，收入錢伯城、郭群一整理，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笈》，頁1082。

⁵² 蔣斧（1866-1911）〈《說文解字校勘記殘稿》跋〉：「原書僅此傳鈔孤本，會沈君太侔有叢書之刊，羅君叔言出此，憊勇授梓，且囑斧為校其偽奪，因識其大略如此」沈宗畸〈《西域水道記》跋〉：「此書寫本，上虞羅氏唐風樓藏，云得之錢唐丁氏善本書室。……宣統紀元三月從羅叔言參事借觀，爰寫校上板，以廣其傳。」沈宗畸〈《寒山金石林部目》跋〉：「此本上虞羅氏所藏，乃二百年前舊抄。」沈宗畸〈《滂喜齋宋元本書目》跋〉：「宣統元年四月，上虞羅叔言參事從給諫（梁案，即陳田）遂錄以詒畸，亟取付剞劂。書目中所列諸書，聞尚完好」；沈宗畸〈《鹿門集》跋〉：「從上虞羅叔言參事鈔得。」沈宗畸編，《晨風閣叢書》（日本關西大學藏宣統元年〔1909〕刻本）。

《高氏三宴詩》、《古洋遺響集》，皆應為《叢書》所據之底本。⁵³ 陶弼（1015-1078）《邕州小集》則是羅振玉從陳毅處傳抄。⁵⁴ 從筆者調查來看，《叢書》所收二十二種著述，僅有《藝芸精舍宋元本書目》、《眉庵詞》不詳其底本來源，其餘二十種皆由羅振玉提供。羅振玉常年流連於書肆，並力求購得善本珍槧而歸，對於異書秘笈更是愛不釋手。他更是刊印古籍以求流布，如王國維〈《雪堂群書序錄》序〉所講：「以學術之存亡為己責，蒐集之、考訂之、流通之，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其尚；極天下之至艱，而卒有以達其志，此於古之刊書者未之前聞，始於吾雪堂先生見之。」⁵⁵ 羅振玉藏書在《叢書》中基礎性地位實已不言自明，此次《曲錄》、《戲曲考原》順利出版，甚至也有借羅氏整理、出版所藏書籍之便的可能性。

除了統籌稿源，《叢書》面臨的另一炙手工作便是籌措刊資。宣統元年（1909）春夏之交，《叢書》出版進入關鍵階段。關於經費，沈宗畸起初曾講：「凡以著述囑刊入本編者，倘因宗旨不合即納費，亦不代刊。如經本社鑒定，即毋庸納費，惟另行抽印若干冊，則須照付印工紙費。」⁵⁶ 儘管沈氏自稱「經本社鑒定，毋庸納費」，但是出

⁵³ 羅振玉、王國維編，《羅氏藏書目錄》記：「《古洋遺響集》一卷，明仿宋本，一本。」「《仁廟聖政記》二卷，明鈔本，一本，前有『禮邸珍玩』印。」「《出圍城記》一卷，舊鈔本，一本，蘇庵道人撰，後又道光丙午春浙江戶部主事朱昌頤鈔一行。」「《全唐詩未備書目》、《明詩綜採集書目》、《兩淮鹽策引證群書目》、《竹垞行笈書目》、朱彝尊，後馮柳東登府跋，及唐庵庵手跋。」「《方叔淵遺稿》一卷，舊鈔本，一本。元方瀾撰，有『甬上叢碧樓董氏金石書畫圖籍藏印』二印。」「《高氏三宴詩集三卷附香山九老詩一卷》，景鈔夷白堂本。」羅振玉、王國維編，《羅氏藏書目錄》，下冊，頁 83、134、146、166、220、231。

⁵⁴ 羅振玉〈《邕州小集》跋〉：「此書從吾鄉沈霞西處士復祭鳴野山方鈔本傳錄，原本借之黃陂陳士可參事，丁未十二月命兒子福萇寫錄，五日而畢。」〔宋〕陶弼，《邕州小集》（大連市圖書館藏羅福萇鈔本）。

⁵⁵ 王國維，〈雪堂校刊群書敘錄序〉，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卷 8，頁 611。

⁵⁶ 沈宗畸，〈本社簡章閱者注意〉，《國學萃編》第 1 卷第 1 期（光緒三十四年〔1908〕2 月），收入姜亞莎等主編，《中國早期國學期刊彙編》，冊 1，頁 86。

版還是面臨資金短缺的窘境。潘飛聲（1858-1934）在收到《叢書》書稿後回函沈宗畸：「《晨風閣叢書》稿已收到，……叢書事前經向夢坡說及，渠無答覆之語，因晨風廬刻書者數十種也。鄙意仍托羅叔蘊與之函商為是，叔蘊則夢坡所素佩者，或可多得書價了。」⁵⁷「夢坡」即清末民初著名實業家周慶雲（1866-1934），字景星，號湘齡，雅好金石，室名息園、夢坡室、晨風廬等。自光緒三十四年（1908）至宣統元年（1909）期間，周慶雲擔任浙江清理財政局議紳、浙江咨議局參議等職。潘飛聲曾就刻資一事尋求周慶雲幫助卻無回覆，故他建議沈宗畸力請羅振玉協調，只因「叔蘊則夢坡所素佩者」。終於在周慶雲、羅振玉的協助下，《叢書》於數月後順利出版。

《晨風閣叢書第一集出售啟》中聲稱「此書乃番禺沈君太侔新刻，其中非舊鈔之孤本，即新著之稿本。悉求之海內藏書家、著作家，均難得之秘笈」，⁵⁸ 而其中屬羅振玉貢獻頗多。《曲錄》、《戲曲考原》作為《叢書》中體量最大、最為重要的兩部書稿，「蒐采宏富，為以前未有之佳著，有裨於文學界不少至」，⁵⁹ 也成為王國維早期戲曲研究的代表作。該書出版不久，羅振玉便將其贈予日本學者內藤湖南（1866-1934）：「（《戲曲考原》）並《曲錄》六卷，己酉歲十一月，清國羅叔言學部所寄也。」⁶⁰ 1925年2月，羅振玉在天津的書籍刻印書鋪貽安堂甚至還有意將此書翻印：「今年二月間，天津貽安堂書鋪有翻印《曲錄》之擬。……忽聞京友已借晨風閣原版抽印《曲錄》

⁵⁷ 潘飛聲，〈潘飛聲致沈宗畸笱〉，收入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編，《容庚藏名人尺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頁216。

⁵⁸ 沈宗畸，〈晨風閣叢書第一集出售啟〉，《國學萃編》第20期（宣統元年〔1909〕10月），收入姜亞莎等編，《中國早期國學期刊彙編》，冊3，頁333。

⁵⁹ 沈宗畸，〈晨風閣叢書第一集出售啟〉，《國學萃編》第20期（宣統元年〔1909〕10月），收入姜亞莎等編，《中國早期國學期刊彙編》，冊3，頁333。

⁶⁰ 〔日〕內藤湖南，〈《戲曲考原》識語〉，收入沈宗畸編，《晨風閣叢書》（日本關西大學藏宣統元年〔1909〕刻本）。

單行本，翻印之擬遂寢。」⁶¹ 由於恰在本年，陳乃乾（1896-1971）已將《叢書》本《曲錄》刷印，故羅振玉重印的設想便未成形。

（二）《海寧王忠愍公遺書》所收《錄鬼簿》、《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

待《宋元戲曲考》完稿，王國維便將治學轉向金石、甲骨等領域。直至王國維去世後，羅振玉、趙萬里在搜檢王國維遺稿時才發現《錄鬼簿》校本與《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手稿。

宣統元年（1909）前後王國維相繼獲藏三部鍾嗣成（1279-1360）《錄鬼簿》，即過錄陳毅所藏明鈔本（下文簡稱「王鈔本」）、曹寅棟亭十二種本（下文簡稱「棟亭本」）與影鈔尤貞起本（下文簡稱「影尤鈔本」）。他的校勘工作主要是在「王鈔本」與「棟亭本」間進行，兩書上也得以記錄下諸多校錄筆記。彼時王國維尋求《錄鬼簿》，一是為編纂《曲錄》搜羅材料，二是有意於重校《錄鬼簿》。⁶² 但是當得知劉世珩也預備校勘《錄鬼簿》後，王國維遂放棄了原先出版計畫。待羅振玉主持《遺書》時才將《錄鬼簿》（下文簡稱「遺書本」）收錄，具體負責校錄《錄鬼簿》的是羅振玉弟羅振常。

需要指出的是，王國維判斷自己從陳毅處借得的為明鈔本，後世學者鮮有目睹陳毅所藏原本，故多襲王氏舊說。陳毅所藏《錄鬼簿》鈔本，後歸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目錄》著錄：「新編《錄鬼簿》二卷，元鍾嗣成撰，舊鈔本。一，一，五〇六五。」⁶³ 此書繼歸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索書號：A074855，

⁶¹ 陳乃乾，〈《曲錄》校補〉，《鑒賞週刊》第6版（1925年8月3日）。

⁶² 參見李家橋，〈王國維抄校《錄鬼簿》考〉，《文獻》2021年第2期（2021年3月），頁152-166。

⁶³ 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編，《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目錄（史部·上冊）》（北京：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民國二十七年〔1938〕鉛印本），頁44下。

書中鈐印有「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仲魚圖像」、「海寧陳鱣觀」、「松門」、「戴印光曾」、「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史語所收藏珍本圖書記」、「傅斯年圖書館」等。⁶⁴ 由於書中不避清諱，王國維判斷為該書是明季精鈔本；然而該書實是由乾嘉時期的嘉興人戴光曾（?-?）所抄，較早注意到此的是趙萬里。孫楷第（1898-1986）在其所藏棟亭本《錄鬼簿》中曾撰跋語：「趙斐雲來，云此鈔本乃戴光曾手鈔本。戴字松門，乾嘉時人。藉嘉興所鈔書甚多。『陳鱣觀』一印係偽作，靜安先生目為明季鈔本，誤也。」⁶⁵ 王鋼新著《錄鬼簿校訂》亦糾正了既往之錯誤。⁶⁶

羅振常首先指出繆荃孫雖然將影鈔尤貞起鈔本寄贈王國維，後者卻未能校理：「丁卯孟夏，以大雲書庫藏舊鈔尤貞起本校一過，知藝風雖以影鈔尤本寄示，觀堂未及校也。」⁶⁷ 他還將王國維於明鈔本上的過錄文字逐錄至自己所藏棟亭本《錄鬼簿》上，此書今藏上海圖書館，書內有一浮簽：「過錄王靜安校錄，又經羅子經以棟亭刻、尤貞起本校一過。」⁶⁸ 書後有羅振常所撰跋：

此書觀堂校本已刊入其全集中，但彼乃以棟亭刻為底本，而以明鈔本、尤貞起本校者。此則過錄明鈔本，而以棟亭刻、尤貞起本校者，與此互有異同詳略。余以見觀堂手抄本，即以棟亭本過錄。其原本即歸扶桑，方編全集時，此本不在遺稿之內，

⁶⁴ 〔元〕鍾嗣成，《錄鬼簿》（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鈔本）。

⁶⁵ 孫楷第，〈《錄鬼簿》跋〉，收入《元曲家考略·錄鬼簿（批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頁195。

⁶⁶ 王鋼，《錄鬼簿校訂》（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頁349-351。

⁶⁷ 羅振常，〈《錄鬼簿》跋〉，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卷1，頁609。

⁶⁸ 〔元〕鍾嗣成，〈浮簽〉，《錄鬼簿》（上海圖書館藏《棟亭藏書十二種本》羅振常批校本）。

故未能合兩校本而一之也。羅振常記。⁶⁹

關於羅振常過錄的王國維批棟亭本《錄鬼簿》，羅莊也有描述：

《王忠愍公遺書》中有校注《錄鬼簿》二卷，乃以棟亭刻為底本，而以明鈔本及《元曲選》、《太和正音譜》等書校之。此本則以明鈔為底本，而以棟亭刻及尤貞起本與他書校之，家大人（梁案，即羅振常）嘗過錄校棟亭本上。《遺書》目錄初編訂見有此書校本，以為即此本也，及印出互校，校語、考證互有詳略，方知為兩本；編《遺書》時僅就所存本（梁案，即「棟亭本」）付刊，而未與此本合而為一。⁷⁰

羅振常指出「遺書本」使用「棟亭本」而未參考「王抄本」，兩種校本在文字上互有詳略，全集「未能合兩校本而一」。據羅振常言，在「王鈔本」尚未東渡時，他即過錄了鈔本上的校改。筆者將東洋文庫所藏「王鈔本」與上海圖書館藏本對比，可知羅振常只是部分逐錄了「王鈔本」上的校改；對於書中的許多細節，羅振常並未悉數照錄。⁷¹

待羅振玉準備刻印王國維的遺書時，「王鈔本」已售至日本：「其原本即歸扶桑，方編全集時，此本不在遺稿之內。」⁷² 1928年七月，羅振常經由文求堂書店向東洋文庫售出「王鈔本」。由於羅振常的手中僅留下「影尤鈔本」及「棟亭本」，後者理所當然地成為了遺書整理的底本。「遺書本」由羅振常的連襟沈舉清（?-?）手鈔過錄再石

⁶⁹ 〔元〕鍾嗣成，〈跋〉，《錄鬼簿》（上海圖書館藏《棟亭藏書十二種本》羅振常批校本）。

⁷⁰ 羅莊評，〔元〕鍾嗣成，《錄鬼簿》，收入《人間校詞筭記十三種》（上海：蟬隱廬刊本），轉引自陳鴻祥，《王國維傳》，頁205。

⁷¹ 〔元〕鍾嗣成，《錄鬼簿》（東洋文庫藏王國維鈔本影印），收入黃仕忠、〔日〕金文京等編，《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第二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冊29，頁4-86。〔元〕鍾嗣成，《錄鬼簿》（上海圖書館藏《棟亭藏書十二種本》羅振常批校本）。

⁷² 〔元〕鍾嗣成，《錄鬼簿》（上海圖書館藏《棟亭藏書十二種本》羅振常批校本）。

印上板，它被安排在了《遺書》最後一集：「凡四集，都四十三種，為卷百二十有一，由羅叔言參事總任校理。其未協定各稿，復由參事邀其及門介休齊君博緣希潞、開封關君葆謙分任編校，經始於丁卯八月，竣工於戊辰五月。」⁷³ 由此得知沈舉清整理《錄鬼簿》當在 1928 年春夏之際，這與東洋文庫於當年七月購得「王鈔本」的時間大體相合。⁷⁴

筆者以為，「棟亭本」在刊刻時已糾正了訛字誤筆，需重新刊誤處少。而「王鈔本」上的校語多與「棟亭本」相抵牾處，然後者原文並不誤。或許從版本意義而言，「王鈔本」優於「棟亭本」，畢竟全書皆出於王氏親筆。但「遺書本」以「棟亭本」為底本，並在此基礎上呈現王國維的校改工作，也實屬情理之中。況且這對於具體承擔校錄工作的沈舉清而言，整理「棟亭本」的難度要遠小於「王鈔本」，想來這也是羅振常留下「棟亭本」而出售「王鈔本」的考量之一。⁷⁵

一同收入《遺書》的還有《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下文簡稱《詞輯》），此書是由羅振玉子羅福葆（1899-1968）校錄。相較於戲曲著作的出版，詞學著述在王國維生前出版的並不多，學術反響也不大。《人間詞話》雖曾先後在《國粹學報》、《盛京時報》連載，但發表之後並沒有引起學界關注。這或許也令王國維頗感不快，以至於當此後陳乃乾預備單獨印行《人間詞話》時，王國維還不無晦澀地說道：「《人間詞話》乃弟十四五年前之作，……但此書弟亦無底稿，不知

⁷³ 觀堂遺書刊行會，〈後記〉，《海寧王忠愍公遺書》（天津羅氏貽安堂民國十七年〔1928〕刻本）。

⁷⁴ 榎一雄言：「這些書先由羅振玉處轉到其弟，即在上海經營『蟬隱廬』書店的羅振常之手。1928年7月，又經文求堂歸入東洋文庫。當時購入價格計3532元。」〔日〕榎一雄〈王國維手抄手校詞曲書二十五種〉，收入吳澤主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輯3，頁317。

⁷⁵ 關於此問題的討論，還可參見陳雅新、張禹，〈錄鬼簿·解題〉，黃仕忠、〔日〕金文京等編，《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第二輯）》，冊29，頁4-5；張禹，〈王國維校《錄鬼簿》考〉（廣州：中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其中所言如何，請將原本寄來一閱，或有所刪定再行付印如何。」並特意要求「發行時，請聲明係第十五年前所作」。⁷⁶ 至於《詞錄》，該書更是長期不為學界所知，直到新世紀以來才被整理刊佈。⁷⁷ 而在王國維的詞學著述中，《詞輯》是體量最大的一部，該書幸得以借《遺書》流傳。

光緒三十四年（1908）五月，王國維據《全唐詩》、《花間詞》、《尊前集》、《歷代詩餘》等輯錄《詞輯》，然此書一直未有出版。這其中只有《南唐二主詞》一種在第二年被收入《叢書》，而所收之本是宣統元年（1909）三月王國維的重新輯錄本。因而在之後近二十年的時間內，學界並不知曉《詞輯》一書的存在，趙萬里《王靜安先生著述目錄》亦將其記為：「《唐五代二十家詞輯》二十卷稿本。」⁷⁸

此番收入《遺書》，羅振玉、首先訂正了書名。在《詞輯》手稿、⁷⁹《王靜安先生著述目錄》中，該書均被題為「唐五代二十家詞輯」，王國維實是將李璟（916-961）、李煜（937-978）合為一家。《遺書》首先將此書改題為「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以正視聽，並為後世沿襲。

與之類似，《宋元戲曲考》一書的名稱也曾經羅振玉、羅振常的調整。1912 年底此書即將撰寫完成，他在寫給繆荃孫的信中提及：「近為商務印書館作《宋元戲曲史》，將近脫藁，共分十六章。……將來仍擬改易書名，編定卷數，另行自刻也。」⁸⁰ 王國維稱其為「宋元戲曲史」，當是應商務印書館之邀。至《遺書》，羅振玉則將其改

⁷⁶ 以上引文，見王國維，〈王國維致陳乃乾〉，收入房鑫亮編，《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563、564。

⁷⁷ 王國維撰，徐德明整理，《詞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年）。

⁷⁸ 趙萬里，〈王靜安先生著述目錄〉，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編，《國學論叢》第 1 卷第 3 號（民國十七年〔1928〕年 4 月），頁 140。

⁷⁹ 王國維，《唐五代二十家詞輯》（四川省圖書館藏光緒三十四年〔1908〕王國維稿本）。

⁸⁰ 王國維，〈王國維致繆荃孫〉，收入房鑫亮編，《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45。

回「宋元戲曲考」，這應是符合了王國維本人的意願。⁸¹

《南唐二主詞》是《詞輯》中較為特殊的一部，羅振玉在整理時採用了王國維後來刊於《叢書》中的底本，而非光緒三十四年（1908）五月手稿本。這是因為雖然《詞輯》作為王國維一部重要遺稿，但是起初的整理本卻存在諸多可商榷的地方，其核心便是王國維將《全唐詩》作為底本。想來也是王國維感到初稿的粗疏，遂遲遲無意於出版。此後沈宗畸預備刻印《叢書》，王國維便重新輯錄《南唐二主詞》。為此，吳昌綬先後向王國維借出汲古閣鈔本、南詞本《南唐二主詞》：「南唐二主詞乃汲古寫定未刻之本，中多附注，尚是宋人之舊（侯刻即出此本）。似當據以為主（《全唐詩》不甚可信），再取他書校補。『南詞本』同出一源。」⁸²不久，吳昌綬又將粟香室叢書復刻侯文燦（1647-1711）《十名家詞集》本《南唐二主詞》送上：「沈君欲刻詞當以曾見著錄者為佳，如南唐二主詞見《直齋書錄解題》。今以重刻侯本奉上。」⁸³至編纂《遺書》時，羅振玉便將《叢書》本《南唐二主詞》收錄，而捨棄掉早先的原稿。後世學人多以為《南唐二主詞》是《詞輯》中最晚出，實是誤解了羅振玉的良苦用心。《詞輯》中的另外十九家，羅振玉使用的則是光緒三十四年（1908）的王氏原稿。⁸⁴

綜上所論，羅振玉在王國維詞曲著述的出版過程中有著極為重要

⁸¹ 葉長海〈《宋元戲曲史》導讀〉亦有言：「但稱《史》，卻並不是王氏的本意，而只是他應商務印書館之命而定名。……王氏辭世後，其友人於1927年編輯《海寧王忠愍公遺書》，其弟及門人於1934年編輯《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內收此書時，均題為《宋元戲曲考》。王氏的友人為什麼要改《史》為《考》呢？我想，完全有可能是王國維本人的意願。」王國維撰，葉長海導讀，《宋元戲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23。

⁸² 吳昌綬，〈吳昌綬致王國維〉，收入馬奔騰編，《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79。

⁸³ 吳昌綬，〈吳昌綬致王國維〉，收入馬奔騰編，《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頁180。

⁸⁴ 關於王國維校錄《南唐二主詞》的過程，還可參見梁帥，〈新見王國維手抄詞書三種考論〉，收入馬興榮等主編，《詞學》（第47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

的影響，他為王國維詞曲著述的傳播、學術地位的確立奠定了基礎。詞曲是二人早期學術合作的重要領域，袁嘉穀（1872-1937）說王國維「的學問原來是羅叔蘊助成的」，⁸⁵ 此語雖有過譽之嫌，但僅就王氏詞曲著述的出版講，當不為過。

四、旅日後羅振玉與王國維的詞曲論學

清末羅振玉疲於繁忙政務，難以專心於學術，其學術研究主要以古籍、金石、甲骨為主，偶見撰有短篇跋語。加之他對詞曲研究本無熱情，所以鮮有與王國維圍繞具體的詞曲問題進行交流。到日之後，羅振玉的空暇時間日漸多了起來，他與王國維的首要工作是整理大雲書庫藏書。此時王國維正在撰寫《宋元戲曲考》，朝夕相處的二人難免會圍繞詞曲展開討論，羅振玉對詞曲的興趣也就漸漸滋生。

而與羅振玉表現出對詞曲研究的興趣不同，旅日後的王國維則日益流露出對詞曲的冷漠。特別是在羅振玉的引導及大雲樓藏書的濡染下：「公既居海東，乃盡棄所學，而寢饋於往歲予所贈諸家之書。」⁸⁶ 待《宋元戲曲考》完稿，王國維便抽離出詞曲研究。1912年二月，青木正兒（1887-1964）拜訪剛剛來日的王國維。據青木氏描述，此時的王國維治學「將趨金石古史，漸倦於詞曲」。⁸⁷ 待撰寫《宋元戲曲史》時，徐森玉（1881-1971）在得見王國維撰寫書稿時亦有描述：「有一天，我去他家，靜庵正在寫《宋元戲曲史》。桌上、書架上擺的都是有關這部書的資料，……隔了一個時期，再到他家……他的書房裏，

⁸⁵ 袁嘉穀，〈我在學部圖書局所遇之王靜安〉，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卷20，頁331。

⁸⁶ 羅振玉，〈海寧王忠愍公傳〉，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卷20，頁229。

⁸⁷ 〔日〕青木正兒，〈序〉，《中國近世戲曲史》（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1。

桌上、架上、凳子上有關那本書的資料，全都收起。」⁸⁸ 不過即便是如此，旅日期間的王國維與羅振玉還是常常圍繞詞曲坐而論道。

詞曲書籍的購入仍然是二人談論的重要話題。1912年七月，王國維、羅振玉、董康共同將目光聚焦在了日本文求堂書店剛從國內運來的一批曲本上。在上世紀初經營漢籍的日本書店中，田中慶太郎（1880-1951）文求堂名聲最大。本年七月，《文求堂唐本書目》刊登了預備出售的下列諸書：

《元槩古今雜劇三十種》，士禮居舊藏，孤本，一匣八本，壹千四百圓。

《雜劇十段錦》十卷，明嘉靖戊午紹陶室刊本，不著撰人姓氏，孤本。錢曾、朱彝尊、李鑑明、郁松年歷藏，十本，四百五拾圓。

明抄本《金貂記》一卷，一帙一本，拾圓。

明抄本《金鎖記》二卷，一帙二本，貳拾圓。

《霍小玉紫釵記》二卷，明刊本，有圖，一帙四本，拾貳圓。

《梁狀元折桂記》二卷，明刊本，有圖，一帙二本，八圓。

明抄本《裴翠園》二卷，一帙四本，貳拾圓。

《信陵君竊符記》二卷，明刊本，有圖，一帙二本，八圓。

《玉茗堂新編南柯夢記》二卷，明刊本，有圖，一帙四本，拾貳圓。

⁸⁸ 許姬傳，《七十年見聞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294。王國維是於京都撰寫的《宋元戲曲考》，其時在1912年底。而查葉笑雪（1916-1998）《徐森玉年譜手稿》、柳向春〈吳興徐森玉先生年表〉，兩者均缺少徐森玉在1912年至1914年間的活動事跡，因此尚無證據證明徐森玉在王國維撰寫《宋元戲曲考》時曾拜會過他，不過筆者在此仍襲許姬傳語。參葉笑雪，《〈徐森玉年譜〉手稿》（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柳向春，〈吳興徐森玉先生年表〉，收入陳燮君、陳克倫主編，《徐森玉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年），頁177-214。

《玉茗堂還魂記》二卷，乾隆乙巳精刊本，一帙二本，貳拾五圓。

《雙鍾記》二卷，一名《合歡鍾》，一帙四本，參圓。

《明月環傳奇》二卷，西湖居士撰，原刊本，一帙二本，四圓。⁸⁹

此次文求堂所售多為精善秘笈。《元槧古今雜劇三十種》，原為黃丕烈（1763-1825）所藏，此書後為羅振玉購去，1914年羅振玉、京都大學又將其復刻。嘉靖三十七年（1558）紹陶室刊本《雜劇十段錦》後被董康所得，1913年誦芬室據此本影印。其餘十種皆被王國維購入。此番三人從文求堂書店所購曲本，當是中國古典戲曲史上的一段佳話了。

此後文求堂書店所售圖書一直吸引著羅振玉、王國維等人關注。1915年春，田中慶太郎送來新近出版的《文求堂唐本書目》，書日記載有一部《誠齋傳奇》：「《誠齋傳奇》二十二種，明初刊黑口本，二帙二十本，貳百元。」⁹⁰並詳細著錄二十二種具體細目。之後羅振玉便致信王國維：「頃田中來，書目一冊，奉覽。內有誠齋□□樂府二十二目，公見過否？原書想可索閱也。」⁹¹此時王國維已無研究詞曲的興趣，羅振玉亦無意於此書，《誠齋樂府》終被董康購去：「董尚藏有《誠齋樂府》，求價尤巨，不可遽獲，而拳拳之懷終不能遺耳。」⁹²

⁸⁹ [日]田中慶太郎編，《文求堂唐本書目》（日本明治四十五年〔1912〕七月鉛印本），收入[日]田中慶太郎編，[日]高田時雄、劉玉才整理，《文求堂書目》，冊3，頁42-44。

⁹⁰ [日]田中慶太郎編，《文求堂唐本書目》（日本大正三年〔1914〕三月鉛印本），收入[日]田中慶太郎編，[日]高田時雄、劉玉才整理，《文求堂書目》，冊4，頁259。

⁹¹ 羅振玉，〈羅振玉致王國維〉，收入王慶祥、蕭立文校注，長春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頁20。

⁹² 袁克文，〈《雜劇十段錦》跋〉，收入[明]佚名編，《雜劇十段錦》（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紹陶室刻本）。

旅日後的羅振玉還屢有刊印詞曲書籍的志趣，他為此多有請教於王國維。1912年春，羅振玉、王國維在若林書屋得見宋咸淳本《詩人玉屑》：「書籍之價尚賤於當日之北京。……宋末刻《詩人玉屑》（稍有缺葉）。索價百五十元。」⁹³不久羅振玉又得日本寬永十六年（1639）刻本《詩人玉屑》，此本為翻刻朝鮮世宗二十一年（1439）鄭麟趾（1396-1478）刻本。羅振玉在粗校一過後，便將宋本、寬永本及清刻本《詩人玉屑》交予王國維，同時對版本間的差別作以概述：

《玉屑》合三本校之，凡本朝刻本所奪，寬永本皆有之，但宋本《詩餘》一門（誤裝十九卷末）則寬永本較多數頁，本朝刊本則與宋本正合。至《中興詞話》，則宋本亦無之。疑鄭麟趾因亦黃玉林所作而附入之，而改廿卷之末，合以《詞話》為一卷。此則寬永本之違古式者也。先生能一一校正，作一跋尾，最善。三本並呈，祈檢入。凡本朝刊本缺頁，已在刊本上折角為記。⁹⁴

羅振玉指出宋本與清刊本相同，寬永本《詩餘》部分較宋本有多出的內容，所收《中興詞話》更是宋本所無。二者差異主要集中於最後兩卷，並通過「刊本上折角」方式提示。王國維接過此書後著手校理：「宣統辛亥冬季，避地日本京都，從若林書屋借得宋本《詩人玉屑》，因校於此本上。二本行款均同，然至二十卷則大有詳略。又此本以《詩餘》另作二十一卷，疑所出之本亦然。」⁹⁵經王國維校對的《詩人玉屑》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王國維所寫校記亦主要集中在卷二十、二

⁹³ 王國維，〈王國維致繆荃孫〉，收入房鑫亮編，《王國維書信日記》，頁37。羅振玉後購得此書，《羅氏藏書目錄》：「《詩人玉屑》二十卷，日本翻高麗本，以宋咸淳刊本校。」參羅振玉、王國維編，《羅氏藏書目錄》，下冊，頁104。

⁹⁴ 羅振玉，〈羅振玉致王國維〉，收入王慶祥、蕭立文校注，長春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26。

⁹⁵ 王國維，〈《詩人玉屑》跋〉，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卷14，頁549。

十一，羅振玉實是為王國維作了初步的比勘工作。

1918年羅振玉編纂《嘉草軒叢書》，預備影印所藏清海寧查容（1636-1685）《浣花詞》。然而他對查氏生平、著述全然不了解，遂請教業已回國的王國維：

弟舊藏查韜荒詞一冊，名《浣花錄》，書法趙董小楷，至精（或出查手寫），名下鈐「韜荒」及「查客」小印。此君乃貴鄉人，弟但知其生於明季，沒於國初（見《疑年錄》），其事實不得知。《國朝詞綜》選登一詞，而履歷寥寥數語；《海昌備志》當有傳，其著作不審著錄否？便乞示複為荷。⁹⁶

羅振玉特意提及可檢《海昌備志》。王國維很快回覆道：

《備志·藝文志》七得之。韜荒名容，號漸江，又號洪翁。布衣，天才超絕，尤肆力於史學。以上小傳。所著有《詠歸錄》（《日下舊聞》引）、《尚志堂文集》六卷（見《金志》。譜云有《尚志堂》、《真樂堂集》共六卷。查岳牧翁《雜記》，云有《樂志堂集》刊於楚中，今不知所歸。）、《漸江詩鈔》十二卷（見《金志》陳氏廷敬序。）、《江漢詩集》（見鈍翁《說鈴》，並載李良年序。又《輜軒錄》云，更有《彈箏集》。管氏云，《彈箏集》僅絕句一體，凡百首。）、《漸江文鈔》二冊（見《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不載其有詞集。觀其詩集諸名，殆終身作客者，故管芷湘於吾鄉文獻最熱，亦不知其有詞也。此君乾隆金、戰二志當有專傳，然現無此書，無從檢也。康熙志無傳，《備志》僅補前志所未備者，故亦不為作傳

⁹⁶ 羅振玉，〈羅振玉致王國維〉，收入王慶祥、蕭立文校注，長春市政协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380。

也。⁹⁷

王國維此封回函完全是襲錄《海昌備志》卷三十三《藝文志七》有關查容的記載，⁹⁸ 而未作補充，查容的著述簡目也被羅振玉〈《浣花詞》跋〉承襲。不過，王國維在信中仍未言及羅振玉最關心的查容生平問題。按照王國維的提示，後來的羅振玉複檢所藏《兩浙輶軒錄》、《午亭文編》與《拜經樓藏書題跋記》，⁹⁹ 進而撰寫〈《浣花詞》跋〉，收錄在影印本之後。從此次合作來看，王國維僅向羅振玉提供線索，羅振玉則按圖索驥，將大雲書庫內的藏書逐一檢視一番。從中不僅得見羅振玉對王國維學術上的倚重，亦能看出羅振玉是將王國維與自己的學術考察結合在一起，而非簡單蹈襲。

1916年二月王國維先於羅振玉返回國內，此後至1919年春，羅振玉仍在京都寄居，他也由此得以保持了王國維與日本漢學界的學術聯絡。日人森川竹溪(1869-1917)編有《詞律大成》二十卷連載於《詩苑》。《詩苑》是「一本以刊登漢詩及漢詩研究為主的同人刊物，讀者群體甚窄，本身影響有限」，據黃仕忠考察，其僅在東京大學獲見，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京都大學等均未見藏。¹⁰⁰ 1916年二月羅振玉致函王國維，請其批閱《詞律大成》：「昨寄《詩苑》一冊，《詞律大成》之末，有弟記注，請觀之，請公亦記住所聞。」¹⁰¹ 王國維閱後認為此書「卷末果有佳句，讀之喜戚交並」。¹⁰² 在羅振玉的聯絡

⁹⁷ 王國維，〈王國維致羅振玉〉，收入房鑫亮編，《王國維書信日記》，頁340。

⁹⁸ 〔清〕管廷芬，《海昌備志》（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道光二十七年〔1847〕尊經閣刻本），卷33。

⁹⁹ 《羅氏藏書目錄》著錄有三書，羅振玉撰〈《浣花詞》跋〉正是參考了它們。

¹⁰⁰ 參黃仕忠，〈森槐南與他的中國戲曲研究〉，《海內外中國戲劇史家自選集·黃仕忠卷》（鄭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頁360。

¹⁰¹ 羅振玉，〈羅振玉致王國維〉，收入王慶祥、蕭立文校注，長春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33。

¹⁰² 王國維，〈王國維致羅振玉〉，收入房鑫亮編，《王國維書信日記》，頁95。

下，日本學人的詞曲著述得以遠渡重洋被王國維閱讀參考。羅振玉此舉不僅有助於王國維瞭解日本漢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亦有借機鼓勵日本學人步靜安詞曲研究進路的用意。王國維的學術研究極重視文獻，羅振玉以及日本京都各圖書館所藏文獻均曾使他受益良多；這也一度使他在回國之初感到不便，羅振玉於是充當起他與日本學界聯繫的紐帶。王國維後來曾向羅振玉表達：「維則每年往東一次，與公同行，暫則住一月，久則數月亦可。每年研究均以家所有書為根本，而至東則參考諸書以成之，此為最妥辦法。」¹⁰³ 1917年應羅振玉之邀，王國維再次赴日，只是彼時他們的學術興趣多不在詞曲方面了。

雖然王國維在離開京都前曾將所藏詞曲贈給羅振玉，昭示出其不再涉獵詞曲的決心：「臨行購得《太平御覽》、《戴氏遺書》殘本，復從韞公乞得複本書若干部，而以詞曲書贈韞公，蓋近日不為此學已數年矣。」¹⁰⁴ 然而回國後的王國維偶有需要昔日所藏，他便請羅振玉代為寄送。

1916年底，此時據離回國僅一年多，應哈同學社之邀，王國維負責主編《學術叢編》。他有意整理周德清（1277-1365）《中原音韻》，遂向羅振玉去信：「學報式已定，如《國學叢刊》，……附印之書，……元刊《中原音韻》雖有明以後刻本，此書終有價值，如他未刊之書不多，則此書亦請檢寄。」¹⁰⁵ 然羅氏並未將此書迅速寄出。正是由於該原因，《學術叢編》只得先行收錄王驥德（1540-1623）《曲律》；在整理時，王國維所據底本是羅振玉舊藏的錢熙祚（?-1844）《指海》所收本，《曲律》被收錄進《學術叢編》第十三卷。1917年，董康《誦芬室讀曲叢刊》也曾翻印《曲律》，董氏同樣向羅振玉去信，羅氏回覆：「《曲律》約百七八十頁，今年分印入《學術叢編》中，但此報

¹⁰³ 王國維，〈王國維致羅振玉〉，收入房鑫亮編，《王國維書信日記》，頁180。

¹⁰⁴ 王國維，《丙辰日記》，收入房鑫亮編，《王國維書信日記》，頁735-736。

¹⁰⁵ 王國維，〈王國維致羅振玉〉，收入房鑫亮編，《王國維書信日記》，頁96。

由哈同花園出版，去年雖已出齊，今年尚未印出一冊。若尊處急須付印者，請函靜翁覓胥鈔寄，因此書在靜公處也。」¹⁰⁶ 然而《學術叢編》僅維持了一年多便宣告停刊，1917年十月王國維去信羅振玉：「渠言哈園《學術叢編》明年擬停辦，此事自在意中。」¹⁰⁷

雖然《學術叢編》沒再繼續，但是哈同花園又請王國維在第二年籌辦「四庫書事」，主要是整理《四庫全書》以外的典籍，「欲以『四庫未收書』為名，……在欲沾一『四庫』之名」。¹⁰⁸ 1918年四月，王國維再次向羅振玉去信言及《中原音韻》：「哈園印書既定多用排印，已先以《淨土三部經音義》付排。……又瞿氏元本《中原音韻》，《四庫》僅存目而未著錄，此書難字無多，可以排印，祈將尊藏景寫本一并攜滬，一切感荷。」¹⁰⁹ 但是此事與「哈同花園」從事的其它活動相近，均為姬覺彌（1887-1964）等人的沽名釣譽行為。事情不久宣告流產，王國維整理《中原音韻》的設想此後再未能付諸實現。

王國維向羅振玉提及的自己早先所藏影鈔鐵琴銅劍樓藏元本《中原音韻》，《王靜安手錄詞曲書目》著錄，今歸四川省圖書館。首頁鈐「大雲精舍」、「李一氓」、「無是樓藏書」、「一氓搜藏詞書種種，一九七七年記」、「無所住齋」、「成都李氏收藏故籍」，¹¹⁰ 由此得知該書先後經羅振玉、李一氓（1903-1990）遞藏。關於該書的獲得，李一氓有回憶：「影寫元鑄周德清《中原音韻》，予數年前得於大連冷攤，似王原藏後歸羅氏者。」¹¹¹ 李一氓在大連獲購該書，這

¹⁰⁶ 羅振玉，〈羅振玉致董康〉，《永豐鄉人手簡釋文》，收入張本義主編，《羅雪堂合集：日記自傳家譜書信·第七函》（杭州：西泠印社，2005年），頁55。

¹⁰⁷ 王國維，〈王國維致羅振玉〉，收入房鑫亮編，《王國維書信日記》，頁276。

¹⁰⁸ 王國維，〈王國維致羅振玉〉，收入房鑫亮編，《王國維書信日記》，頁296。

¹⁰⁹ 王國維，〈王國維致羅振玉〉，收入房鑫亮編，《王國維書信日記》，頁323。

¹¹⁰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四川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¹¹¹ 李一氓，《王靜安手錄詞曲書目》，收入李一氓編，《一氓題跋》（北京：三聯書店，1981年），頁288。

當是從羅振玉位於旅順的大雲書庫流出，故《中原音韻》在歸入羅氏後，應再未返回王國維處。¹¹²

王國維早年涉足於戲曲時，其最重要的動機便是提振戲曲在中國文學的地位，為此他不斷強調：「吾中國文學之最不振者，莫戲曲若。元之雜劇、明之傳奇存於今日者，尚以百數。……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獨有志乎是也。」¹¹³ 王國維堅定地認為戲曲對於深刻把握中國古典文學審美特徵與價值，具有重要意義：「其有造於中國文學者豈淺鮮也。」¹¹⁴ 儘管彼時的王國維早已不專門從事詞曲，但他並未捨棄這一使命擔當，他欲將《中原音韻》、《曲律》等書刊布流傳，以及校錄《四部叢刊》本《花間集》，這顯然有承續此前學術進路的意思。羅振玉長期珍藏著王氏早年所持詞曲書籍，這為後者延續相關研究提供了可能。

相比於吳昌綏、樊炳清（1877-1929）、劉世珩等人對詞曲有著精到見解，羅振玉與王國維談論詞曲多是圍繞具體書冊展開。羅振玉的關注點也非詞曲文體、作品審美蘊藉之類，而多是圍繞作品版本、作家生平史實、文本異文等展開。這與羅振玉本身對詞曲缺乏研究有關，因而其對王國維詞曲研究的倚重是極為明顯的。不過當王國維離開日本、不再研治詞曲時，羅振玉仍然將其與日本漢學界密切聯繫起來，並隨時為王國維的詞曲研究提供書籍支持，這足夠看出二人的詞曲聯繫實至密切。

¹¹² 梁帥，〈《中原音韻》與王國維的戲曲研究〉，《南大戲劇論叢》2023年第1輯（2023年12月）；待刊，詳細考察王國維所藏影鈔本《中原音韻》的獲藏經過，及與《曲調源流表》《宋元戲曲史》等王氏戲曲著述之關係。

¹¹³ 王國維，〈三十自序（二）〉，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卷14，頁122。

¹¹⁴ 王國維，〈曲錄序言〉，《曲錄》（宣統元年〔1909〕三月稿本），頁3上。

五、《王靜安手錄詞曲書目》與羅振玉藏書目錄「詞曲類」的編纂

旅日後的羅振玉與王國維在學術聯絡方面日趨緊密，王國維甚至曾將自己的詞曲書目借予羅振玉，以助其編纂大雲書庫藏書目錄。

宣統三年（1911）十月武昌起義爆發，北京政局岌岌可危。內藤湖南、狩野直喜（1868-1947）等羅振玉在京都大學的好友紛紛建議他避難日本，並告知其可以先將藏書暫寄於京都大學圖書館內。羅振玉隨即與藤田豐八（1869-1929）等人商議動身事宜，一同赴日的還有王國維以及羅振玉長婿劉大紳。羅振玉一行於當年次月起行，經由北京、天津、神戶，抵達京都。自此時起至 1913 年春遷居淨土寺新建住宅，羅振玉、王國維一直住在京都大學附近的田中之家。此時的王國維與羅振玉是比鄰而居：「是時羅先生家，人多地仄，先生乃移居鄰屋。」¹¹⁵

在羅振玉、王國維赴日前，他們曾整理出一份藏書目錄。後來羅振玉將目錄交於妻弟范兆昌（?-?），並囑咐其幫助裝箱托運書籍，待事畢後再將書目寄予王國維：「各物裝好後，速將藏書底（帳目）寄東，交王靜翁，恐兄已啓行返都也。」¹¹⁶ 圖書、龜板等不久運抵京都：「圖書長物運之逾月乃竟，又棄重大不易致者。」¹¹⁷ 然而它們在經歷遠渡重洋後多有破壞損毀，羅振玉給范兆昌抱怨道：「此次運送各件，大半破損，從高處擲下，可恨至極。」¹¹⁸ 王國維在給繆荃孫的

¹¹⁵ 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編，《國學論叢》第 1 卷第 3 號（民國十七年〔1928〕年 4 月），頁 95。

¹¹⁶ 羅振玉，〈羅振玉致范兆昌〉，《永豐鄉人家書釋文》，收入張本義主編，《羅雪堂合集：日記自傳家譜書信·第七函》，冊 2，頁 46。

¹¹⁷ 羅繼祖輯述，〈永豐鄉人行年錄〉，收入羅繼祖主編，《羅振玉學術論著集》，冊 12，頁 386。

¹¹⁸ 羅振玉，〈永豐鄉人家書釋文〉，收入張本義主編，《羅雪堂合集：日記自傳家譜書信·第

信中還對編目完工的時間作了預估：「此次裝箱搬運錯亂太甚，大約至明春二月方能就緒，目錄亦可寫定矣。」¹¹⁹ 一同運抵京都的除了羅振玉藏書外還有王國維的藏書，它們最初被堆放在京都大學圖書館內，館長日新出（1876-1967）就曾在館內見過王國維所藏外文書籍。¹²⁰ 羅振玉、王國維抵日後的首要工作便是重新核定、編目藏書。

書目的正式整理工作是從 1912 年春開始，果如王國維所料，編目工作持續了近一年時間，多年後的王國維對此仍心有餘悸：「辛壬之交初抵日本，與叔言參事整理其所藏書籍，殆近一年。」¹²¹

二人最先整理好的是善本部分，目錄隨即被京都大學圖書館錄副（下文簡稱「京大本」）。據圖書館司書官山鹿誠之助（1885-1956）回憶：「從大正元年（1912）到二年交際的時候，羅振玉氏有意將其藏書寄託給京都大學。而本學附屬圖書館在一段時期內保管了他的藏書，並於開始製作目錄時將其謄寫。」¹²² 京都大學所錄副本於 1913 年五月入藏該館，即「京大本」的「宋元本之部」與「鈔本之部」的兩冊。¹²³

之後羅振玉、王國維便著手整理普通本。然而羅振玉的藏書中並無詞曲類，難堪完備。羅莊回憶道：

七函》（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 年），冊 2，頁 47。

¹¹⁹ 王國維，〈王國維致繆荃孫〉，收入房鑫亮編，《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37。

¹²⁰ 〔日〕日新出：「大正初年，羅振玉曾將其藏書寄存在京都大學圖書館裏，王君為此事與圖書館工作人員多次交涉，花了不少力氣。……那時在圖書館三樓的一個角落裏，羅氏寄存的圖書堆邊上整齊地擺放著數十本外文書，其中有康德、叔本華等西洋哲學家的名著，我不禁好奇地打聽書的主人，當被告知這些是王君的藏書時，我纔知道王君的學問汲取了西哲的思想。」〔日〕日新出，〈海寧的王靜安君〉，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卷 20，頁 391。

¹²¹ 王國維，〈王國維致柯劭忞〉，收入房鑫亮編，《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491。

¹²² 〔日〕山鹿誠之助，〈識語〉，收入羅振玉、王國維編，《羅氏藏書目錄》，上冊，頁 4。

¹²³ 參〔日〕道坂昭廣，〈關於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羅氏藏書目錄》〉，收入羅振玉、王國維編，《羅氏藏書目錄》，下冊，頁 239。

辛亥後，公及伯父（按，即羅振玉）、家大人避地東瀛，嘗為伯父編《大雲書庫藏書目》，見經部經說、小學之書重本甚多，而集部中詞曲竟無一種，以為偏枯。時，公欲研究經學、小學，乃悉取其重本去，而以所藏之詞曲補其缺。¹²⁴

這段話證明「京大本」普通本部分的「詞曲類」襲用的正是王國維所藏詞曲目錄。而王國維所撰詞曲藏書的底稿也未遺失，今藏於四川省圖書館，這是一部向未見學界關注的王氏手稿。

《王靜安手錄詞曲書目》（下文簡稱《詞曲書目》）總計 16 頁，全文謄寫在「唐風樓校寫」稿紙上。開篇頂格書「詞曲類」，故在此類前，接續的當有其他類書目。「京大本」普通本書目分「經」、「史」、「子」、「集」和「叢書」各一冊，善本書目為「宋元本」和「鈔本」各一冊。「詞曲類」位於「集」部冊末尾，由此推知《詞曲書目》之前當為集部的「總集類」。¹²⁵

王國維在書目中著錄有詞集 87 種、97 部，曲本 52 種、59 部，其中詞類、曲類的每一類間均有空行。詞籍部分，依次著錄詞總集、別集、選集；曲類是按照戲曲選本、單刻曲本、曲選、曲譜等順序著錄，體現出明確的分類意識。王國維早年在《靜庵藏書目》也同樣採取了空行、分頁的方法來區分不同類型的典籍，這便於快速找尋所需文獻，體現出目錄務求實用的原則。

與《靜庵藏書目》手稿本相同，¹²⁶《詞曲書目》眉批處也出現了○、△兩種圈識符號。其中 9 種詞籍、13 種曲籍標有○，明刊本《盛

¹²⁴ 羅莊，〈《錄鬼簿》按語〉，《人間校詞笈記十三種》（上海：蟬隱廬刊本）附錄，轉引自陳鴻祥，《王國維傳》，頁 205。

¹²⁵ 王國維，《王靜安手錄詞曲書目》（四川省圖書館藏民國稿本）。

¹²⁶ 《靜庵藏書目》中的陸游《南唐書》、高棅《唐詩品匯》眉批處有○圈識符號。參王國維，《人間詞話·手稿》（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 年），頁 50、57。

明雜劇（初集）》標△，它們當是指書目中的善本。¹²⁷ 具體分析這些符號，王國維著錄的明刊本詞集、曲籍全被標出○；在曲籍中，除明刊本外，王國維以元、明鈔本為底本的影寫本也被標○。未被標識的詞籍或為習見之書，它們多刊於清末，且以刻本、排印本居多；或是王國維過錄本，它們多抄錄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至宣統元年（1909）間。

書目所記最晚的當屬王炎（1137-1218）《雙溪詩餘》鈔本。王國維曾在《詞錄》中注明該書有四印齋刻本，1912年夏王國維又在董康處得見嘉靖本《雙溪文集》：「王子夏，於董氏誦芬室見雙溪文集殘本（明嘉靖刊），幸詩餘尚全。因假歸，令兒子潛明影寫之。夏至後四日，國維記。」¹²⁸ 由此推斷《詞曲書目》的編纂不會早於1912年夏，此時王國維赴日也半年有餘。《詞曲書目》編纂時間的下限則在本年底。因為王國維在《詞曲書目》的眉批處補入了從文求堂書店所購得的十種曲本，由此推知底稿初版的編寫是在1912年七月之前，其整體編就當是在本年底。

《詞曲書目》最終得以借「京大本」流傳，筆者以為這與此期日

¹²⁷ 具體書目如下：毛晉《宋六十一家詞五集》（汲古閣原刊本）、張孝祥（1132-1169）《于湖先生長短句》（鈔本）、夏言（1482-1548）《桂翁詞》（嘉靖丙寅金陵童氏刊本，怡邸藏書）、《新刊古今名賢草堂詩餘》（明嘉靖間三衢童子山李謹刊本）、《花間集》（明正德十六年〔1521〕陸元大仿宋晁謙之刻本）、《類編草堂詩餘》（嘉靖庚戌刊本）、《重刊類編草堂詩餘評林》（萬曆刊本）、《草堂詩餘》（汲古閣刊《詞苑英華》本）、《梅苑》（棟亭十二種本，以明鈔本校），曲籍部分的《元曲選》（明刊本）、《傳奇十種》（明文林堂刊本）、《六十種曲》（明刊本）、《西廂記》（明閩齊伋校刊本）、《明劇七種》（鈔本）、《西廂記》（明歸安凌氏刊朱墨本）、《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南陵徐氏景元刊本）、《梨園按試樂府新聲》（影鈔常熟瞿氏藏元本）、《雍熙樂府》（明嘉靖二十一年楚愍王刊本）、《詞林白雪》（萬曆刊本）、《中原音韻》（影寫常熟瞿氏藏元本）、《音韻須知》（內府刊本）、《錄鬼簿》（影寫明尤貞起鈔本、過錄明鈔本、曹棟亭十二種本）。

¹²⁸ 〔日〕榎一雄，〈王國維手抄詞曲書二十五種〉，收入吳澤主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輯3，頁320。

本漢學界的中國戲曲研究熱潮有關。王國維的到來引起日本古典戲曲研究界的極大關注。雖然自明治年間森槐南（1863-1911）、幸田露伴（1867-1947）始，日本漢學界不乏投身古典戲曲者，然而日本學人多願意承認王國維對其研究的影響，如狩野直喜：「當時我已打算研究元雜劇，在京都大學也開始講授這門課。王靜安恰巧與我志趣相同，也作了一些這方面的研究。」¹²⁹ 鈴木虎雄（1878-1963）也講到：「我知道王靜庵君是在他的《戲曲考原》、《曲錄》問世之時。讀過這本書後，我在《藝文》上介紹了概要。」¹³⁰ 青木正兒草擬《中國近世戲曲史》時更是數次造訪王國維，後者還有「明以後無足取，元曲為活文學，明清之曲，死文學也」的論斷。¹³¹ 彼時的王國維被日本漢學界奉為中國古典詞曲尤其是戲曲研究的最重要學者，其藏書也必然引起他們的關注。再反觀日本所藏中國戲曲文獻，雖然早在江戶時代（1603-1868）便多有傳入，但日本學界長期以來缺乏相關目錄學著述。因而將靜安所藏詞曲進行編目，這不僅是書籍初到日本後理應完成的清點工作，也契合了日本漢學界希望一睹珍稀詞曲文獻的渴望。羅振玉藏書目錄中詞曲部分的缺乏，加之日本漢學界的殷切期望，共同促使王國維對所藏詞曲進行編目，並通過「京大本」為日本漢學界所瞭解。¹³²

在《詞曲書目》被整體遷入羅振玉的藏書日後，所錄文獻便多為羅氏使用。如 1914 年二月羅振玉著手編纂《續匯刻書目》，他對書

¹²⁹ 〔日〕狩野直喜，〈回憶王靜安君〉，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卷 20，頁 370。

¹³⁰ 〔日〕鈴木虎雄，〈追憶王靜安君〉，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卷 20，頁 377。

¹³¹ 〔日〕青木正兒，〈序〉，《中國近世戲曲史》，頁 1。

¹³² 關於明治時期的日本學者與王國維的戲曲研究之關係，參見黃仕忠，〈從森槐南、幸田露伴到王國維：日本明治時期的中國戲曲研究〉，《戲劇研究》第 4 期（2009 年 7 月），頁 155-194。

中所涉材料的來源有描述：

幸予所藏書尚存行篋，乃發憤獨任之，始於今年二月，訖於閏月，凡百五十日。間就予大雲書庫所蓄，補錄光宣兩朝諸家叢刻，及刊於光宣以前，而朱目失載者。凡得三百餘種，未敢云備舉無遺，然亦略具矣。間有所缺，則假之繆氏藝風堂。其顧書所載，朱氏遺之者，亦就予儲書所有者補之。其不可見者，寧闕之不補也。……此書既寫定，讀吾友藤田劍峰學士豐八藏書目，見有此編失載者數種，爰移書求寫寄。又內藤湖南博士虎次郎、富岡君搗教授謙藏，亦寫示日本高麗諸叢刻，復據以補入。¹³³

據羅振玉講《續匯刻書目》的材料主要是「大雲書庫所蓄」，所缺之本借用繆荃孫的藏書，內藤湖南、富岡謙藏（1873-1918）等日本學人亦有襄助。羅振玉還特意講到「不可見者，寧闕之不補也」。《續匯刻書目》癸集專錄詞曲，其中的明文林閣刊《傳奇十種》、明吳興閔氏刊《六幻西廂》、明宣德本《誠齋樂府》、康熙錢唐李氏刊《范氏三種曲》、道光振綺堂刊《瓶笙館修簫譜》，當是據自《詞曲書目》，它們自然是被羅振玉劃為了「大雲書庫所蓄」。

直至 1916 年二月王國維離開京都，臨行前他再次明確了將所藏詞曲書籍悉數贈與羅振玉：「臨行購得《太平御覽》、《戴氏遺書》殘本，復從韞公乞得複本書若干部，而以詞曲書贈韞公，蓋近日不為此學已數年矣。」¹³⁴ 王國維以所藏詞曲贈予羅振玉，這既是對從羅振玉處索得複本書的回饋，更是對羅振玉給予自己多年來的幫助照料以答謝。

¹³³ 羅振玉，〈《續匯刻書目》序〉，收入羅振玉、王國維編《續匯刻書目》（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連平范氏雙魚堂〔1915〕刊本）。

¹³⁴ 王國維，《丙辰日記》，收入房鑫亮編，《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735-736。

六、羅振玉、羅振常與王國維舊藏詞曲書籍的出售

隨著王國維的舊藏詞曲轉入大雲樓書庫，在其生前，它們一直被羅家持有著。直至 1927 年六月王國維去世，伴隨著整理王國維遺稿工作的開展，羅振玉開始有意售出這批藏書，此時羅振常主持的蟬隱廬書店在出售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羅振常，字子經、子敬，號蟬隱、邈園。辛亥之後，羅振常與羅振玉一道扶桑東渡，後於 1914 年回國定居上海，不久便在滬上開設了蟬隱廬書店，以售書度日。羅振常精於古籍版本，又善於校勘，王國維的《詞錄》就曾多得羅振常補充材料。寓居滬上期間，他與劉承幹（1881-1963）、王國維等多有往來，其蟬隱廬書店更是王國維踏訪最多的地方。受意於羅振玉的安排，羅振常承擔了王國維舊藏詞曲書籍的出售事宜。為了售出這批王國維舊藏詞曲，羅振常採取了分批、分途徑的出售方式。

其一，他向彼時海內外有意於收藏詞曲的名家去信，主動介紹王國維舊藏詞曲的細目、來源與售價等。筆者於 2018 年華東師範大學、西泠印社主辦的《雪堂雅集》展覽會上，幸見得一封羅振常寫於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1904-1980）的書信，茲首先將書信原文逐錄如下：

吉川先生執事：

前寄之書，諒久經收入矣。入夏以來，維撰祺增吉，為頌無量。昔有陳者，記得三四年前閣下托敝處訪覓明板有圖傳奇，曾代訪得《紅拂記》三種。尊處出價百元，後因其人竟不欲售，遂未奉複。現在有人有大宗詞曲出托敝處代售，此宗書乃敝邦學者王國維氏所藏，當其生前與其友人易經學、小學書者。今王氏物故，身後蕭條，其友人因出售此書，為王氏遺族養贍之費，其中頗多佳本，約百餘種。今將其中云曲子佳本少見者，擇出

一部分，錄目開價呈覽。各種有圖者故須明，每種皆有王氏印記，所開價乃會王氏知友公估酌定。尊處如需何種，望速示知。其價因為其遺族之用，以多為佳，故不能廉，但亦非不可商。敝國購曲者每甚多，須以其價付之競爭。尊處必要者，照價數好。如須減讓，可畀一最多之額，免為他人所得。此函到時，待尊處復函到，其書恐已有售者，故宜速復為佳。敬請吟安。

蟬隱廬上，五月二十四日。¹³⁵

吉川幸次郎，字善之，號宛亭，曾問學於狩野直喜。早年留學於北京大學，後任京都大學教授。今京都大學藏《折桂記》鈐有「王國維」、「話曲居」印，故知此書曾經王國維、吉川氏遞藏，或正是此次羅振常售予吉川氏之書。¹³⁶

周一平曾推測王國維返回國內後直接將所藏詞曲轉手給了羅振常，而未經手羅振玉。¹³⁷ 而由羅振常所言「有人有大宗詞曲出托，敝處代售此宗」判斷，王國維舊藏詞曲當一直是在羅振玉手上，只是在出售時才由蟬隱廬書肆代售。羅振常進而指出這批書為「生前與其友人易經學、小學書者」，所言即是其兄羅振玉。羅振常女羅莊對伯父與王國維交換書籍一事也有回憶：「辛亥後，公及伯父（按，即羅振玉）、家大人避地東瀛，嘗為伯父編《大雲書庫藏書目》，見經部經說、小學之書重本甚多，而集部中詞曲竟無一種，以為偏枯。時，公欲研究經學、小學，乃悉取其重本去，而以所藏之詞曲補其缺。」¹³⁸

¹³⁵ 丁小明、陸豐川編，《雪堂雅集：羅振玉、王國維的學術世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杭州：西泠印社，2018年），頁223。

¹³⁶ 〔明〕秦淮居士，《折桂記》（京都大學文學部藏明刊本）。

¹³⁷ 周一平，〈〈王國維手鈔手校詞曲書二十五種〉讀後〉，收入吳澤主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輯2，頁369。

¹³⁸ 羅莊評《人間校詞笥記十三種》（上海蟬隱廬刊本），轉引自陳鴻祥，《王國維傳》，頁205。

由上述兩條文獻來看，王國維從羅振玉處得到的書籍主要是經部、小學。王國維回國後相繼撰有〈殷周制度論〉、〈六朝人韻書分部說〉、〈唐韻別本考〉，這些研究多與王國維從大雲樓書庫所得經部、小學諸書有著明顯的關聯。

羅振常在信中著重強調所售之書「其價因為其遺族之用，以多為佳」。與之同時，信中還提及「敝國購曲者每甚多，須以其價付之競爭」，可見羅振常當是向多位日本學者聯繫討論王國維舊藏詞曲的購買事宜。據黃仕忠調查，此後得到王國維舊藏詞曲的日本學者還有內藤湖南、青木正兒等日本學人。¹³⁹ 其中王國維舊藏歸安凌氏刊朱墨《西廂記》後歸內藤湖南，該書第四冊內封有一段內藤湖南的識語：「丁卯六月，王忠愍公自沉殉節，滬上蟬隱主人售其舊藏以充恤孤之資。予因購獲此書，永為紀念。九月由滬上到。」¹⁴⁰ 可知羅振常在分別向內藤湖南、吉川幸次郎出售王氏舊藏時，均提及所得書款將用於王氏後人。今已無線索考證羅振常所得書款是否真實地交給王氏後人，但不得不說羅振常在售書時的這一說辭，讓對王國維多有崇敬的日本學人會有所觸動，後者因而在價格上多有慷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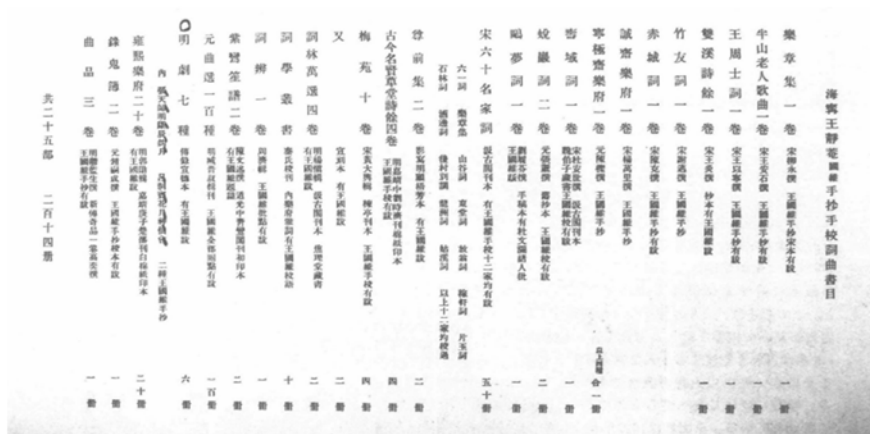
另，京都大學藏明宣德刊本《周憲王樂府三種》、明金陵文林堂《傳奇十種》、明刊本《折桂記》、鈔本《西堂曲腋》，大谷大學所藏明歸安凌氏刊朱墨本《西廂記》、明刊本《南柯記》、《紫釵記》、《竊符記》、《曇花記》，皆為王國維舊藏。其中內藤湖南後將所得朱墨本《西廂記》贈予神田喜一郎（1897-1984），《南柯記》、《紫釵記》、《竊符記》經久保天隨（1875-1934）、神田喜一郎遞藏，《曇花記》則直接為神田喜一郎所購。神田喜一郎，字信暢，鬯齋，曾任

¹³⁹ 參黃仕忠《日藏中國戲曲文獻綜錄》。另，黃仕忠〈王國維舊藏善本詞曲書籍的歸屬〉亦對王國維舊藏戲曲流入日本的部分作了梳理。

¹⁴⁰ 〔日〕內藤湖南，〈《西廂記》識語〉，收入〔元〕王實甫，《西廂記》（大谷大學圖書館藏明歸安凌氏刊本）。

臺北帝國大學、大谷大學等校教授，大谷大學所藏王氏舊物當皆是源自神田氏。

除了直接向日本學界出售王國維舊藏，羅振常還經由文求堂書店向日本學界出售了一批。青木正兒所藏《曲錄》內有《海寧王靜安（國維）手抄手校詞曲書目》，著錄有書名、作者、版本等，此為文求堂給蟬隱廬書店代售王國維舊藏詞曲時所編的目錄。1928年七月，東洋文庫經由文求堂書店將其買入，僅有《王周士詞》未購。據榎一雄記載，這批書的購入價格是 3532 元。關於這一部分，榎一雄《王國維手抄手校詞曲書二十五種》已有詳論，茲不贅述。¹⁴¹



圖一：〈海寧王靜庵（國維）手抄手校詞曲書目〉，青木正兒藏。¹⁴²

此外，羅振常也將出售靜安舊藏詞曲的消息刊登在《蟬隱廬舊本書目》上。自 1915 年蟬隱廬設立以後，羅振常便不定期地出版售書

¹⁴¹ [日]榎一雄，〈王國維手抄手校詞曲書二十五種〉，收入吳澤主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輯 3，頁 313-338。

¹⁴² 文求堂書店，〈海寧王靜安（國維）手抄手校詞曲書目〉，轉引自黃仕忠，《日藏中國戲曲文獻綜錄》，無頁碼。

目錄。1928年五月《蟬隱廬舊本書目》編至第十六期，多部王國維舊藏詞曲出現在書目中，其售價遠高於其他同類古籍，今將具體細目整理如下：

《放翁詞》一卷，宋陸游撰，汲古閣刊本，初印，王觀堂藏書。一冊，二元。

《山中白雲詞》八卷，宋張炎撰，雍正中上海曹氏刻本，王觀堂藏書。四冊，六元。

《桂翁詞》六卷，《鷗園新曲》一卷，明夏言撰，嘉靖中童氏刊本，有牌字「怡府藏書」，王觀堂藏書。四冊，三十六元。

《二薌亭詞》四卷，《拾遺》一卷，宋琬撰，康熙中原刊本，有王韜手跋，王觀堂藏。二冊，六元。

《花間集》十卷，蜀趙崇祚輯，汲古閣刊本，王觀堂藏書。二冊，六元。

《類編草堂詩餘評林》六卷，唐順之輯，萬曆中精刻本，王觀堂藏書。四冊，十六元。

《詞綜》三十六卷，朱彝尊輯。《明詞綜》、《國朝詞綜》四十八卷，《二集》八卷，王昶輯。原刊本，王觀堂藏書。二十冊，十六元。

《天籟軒詞選》六卷，《本事詞》二卷，《閩詞鈔》、《小庚詞存》各四卷，葉申薌輯，道光中刊本，白紙印，王氏藏。十二冊，十四元。

《嘯餘譜》十一卷，明程明善撰，明刻本，王觀堂藏書。十冊，三十元。

《小山樂府》六卷，元張可久撰，舊鈔本，吳枚庵、王觀堂遞藏。四冊，三十二元。

《燕子箋記》二卷，明阮大鍼撰，董氏重刻永懷堂本，宣紙初

印，極精，王觀堂藏書。二冊，八元。

《上林春》不分卷，明鈔本，王觀堂藏書。四冊，三十六元。

《秣陵春》二卷，吳偉業撰，振古齋刊本，王觀堂藏書。四冊，十四元。

《南北宮詞紀》十二卷，明陳所聞、陳邦泰輯，萬曆精刻本，王觀堂藏書。六冊，十六元。

《錄鬼簿》二卷，元鍾嗣成撰，舊鈔本，王觀堂藏書。二冊，三十元。

《燕子箋記》二卷，明阮大鍼撰，董氏重刻永懷堂本，宣紙初印，極精，王觀堂藏書。二冊，八元。¹⁴³

總計十六種，八十三冊，售價二百七十六元，最貴不過三十六元。然而這批書並非一經刊出，即遭到買家的搶購。如王國維藏舊鈔本《錄鬼簿》一直拖到後一年（1930）的十一月還未賣出，羅振常不得不將價格調整為二十五元。¹⁴⁴ 根據筆者調查，這些書後來多數是被國內藏家購去，如鄭振鐸購《桂翁詞》，周越然（1885-1962）購入《上林春》等。經吳翊鳳（1742-1819）、王國維遞藏的《小山樂府》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尤貞起鈔本《錄鬼簿》的影鈔本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以上各書幸未流失異邦。

在上述三批出售過程中，以第二批的數量最多、版本價值最高，因而也只有像東洋文庫這樣的大財閥才有資力將其一並購入。羅振常分售給日本學人的次之，其基本為明刊本、鈔本。《蟬隱廬舊本書目》刊登的書冊價值殿之，這其中甚至還混入了 1920 年董康誦芬室覆刊

¹⁴³ 羅振常，《蟬隱廬舊本書目》第 16 期（民國十七年〔1928〕鉛印本），收入徐蜀、宋安莉編，《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冊 27，頁 114-118。

¹⁴⁴ 羅振常，《蟬隱廬舊本書目》第 20 期（民國十九年〔1930〕鉛印本），收入徐蜀、宋安莉編，《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冊 27，頁 133。

永懷堂本《燕子箋》一類的本子。在書目內容上，售予東洋文庫的以詞類著作為主，曲籍僅有《元曲選》等五種。吉川幸次郎、青木正兒等人所得皆為戲曲，這顯然是羅振常有意將王國維舊藏戲曲售予有心於接踵靜安遺志而振興曲學者。《蟬隱廬舊本書目》雜而有之，以詞籍為主。筆者推想羅振常先將善本戲曲挑出，分售諸日本學人；再擇其中之精善秘本，一次性通過文求堂書店賣給東洋文庫；最後剩下的詞曲書冊由蟬隱廬陸續分售。

除上述提及的詞曲書籍外，還有王國維舊藏詞曲不見羅振常的銷售記錄。如現今已知周越然是購得王國維舊藏戲曲最多的私人藏家。周越然，名之彥，浙江吳興人，民國期間曾在上海國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等地任職，酷嗜藏書，辟有言言齋藏書室。上海圖書館藏《吳興周氏言言齋藏曲目》鈔本，著錄的寫樣未刻本《財星照》、精寫本《金鎖記》、明鈔本《上林春》、精寫本《翡翠園》、舊鈔本《金貂記》、閔寓五《六幻西廂》、明新都蒲水齋刊本《牡丹亭》，以及明金陵富春堂刊《雙忠記》《白兔記》《躍鯉記》《十義記》（合稱「忠孝結義四大傳奇」），皆有「王國維」朱文方印，總計十一種。¹⁴⁵ 這些書籍當同樣出自羅振玉、羅振常處，不過目前未見相關出售信息。

七、結語

彭玉平《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一書詳細考察了王國維與吳昌綬、樊炳清、羅振常等八位同時期詞曲研究學者的學緣關係。如吳昌綬對王國維詞學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若干詞學成果中。王國維撰寫《詞錄》、校勘詞籍，吳昌綬便提供大量版本支持。今東洋文庫所藏王國維諸校勘後的詞籍，便有多部是應吳昌綬之邀而作，亦有吳氏提供的

¹⁴⁵ 周越然，《吳興周氏言言齋藏曲目》（上海圖書館藏 1950 年陸萼庭鈔本）。

底本與參校本。而王國維與樊炳清的談詞論詞經歷，以及二人的詞學觀念，也被王國維收錄進由其代筆的〈人間詞甲稿序〉和〈人間詞乙稿序〉。羅振常與王國維的詞學關係也頗為緊密，他不僅完整保存了王氏遺稿《詞錄》，還編有《觀堂詩詞彙編》，後者是最早的王國維詩詞合編本。

相比於上述諸人，羅振玉與王國維詞曲研究的學術因緣關係則顯得撲朔迷離。因為當王國維致力於詞曲時，一來此時的羅振玉本無心於此，二人圍繞於此的學術交流也較少；二來現今保存下來的二人書信主要從 1913 年始，這又為後來學者的考察帶來極大困難。不過仔細爬梳相關文獻，還是能夠隱約窺得二人的學術聯繫。如羅振玉的唐風樓、大雲樓書庫所藏諸詞曲書，為王國維的詞曲研究提供了不少的版本支持。王國維詞曲著述的刊印、流布，更是得益於羅振玉的多有出力。到日之後，二人書信中亦時常涉及詞籍校勘。待王國維去世之後，羅振玉、羅振常則是有條不紊地出售王氏舊藏詞曲。從本質上看，羅振玉其實是將王國維與體制外詞曲學聯繫起來的關鍵人物。明確了這一學術因緣，對於全面考察王國維與羅振玉的學術聯繫，並窺視二十世紀初的詞曲研究生態頗有意義。

（責任校對：徐滋妤）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五代〕趙崇祚編，《花間集》，四川省圖書館藏正德十六年（1521）吳郡陸元大刻本。
- _____，〈《花間集》〉，據國家圖書館藏《四部叢刊》明萬曆三十年（1602）玄覽齋本影印。
- 〔宋〕佚名編，《尊前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年（1582）年顧梧芳刻本。
- 〔宋〕陶弼，《邕州小集》，大連市圖書館藏羅福萇鈔本。
- 〔元〕王實甫，《西廂記》，大谷大學圖書館藏明歸安凌氏刊本。
-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四川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 〔元〕鍾嗣成，《錄鬼簿》，上海圖書館藏《棟亭藏書十二種本》羅振常批校本。
- _____，〈《錄鬼簿》〉，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鈔本。
- _____，〈《錄鬼簿》〉，東洋文庫藏王國維鈔本影印，收入黃仕忠、〔日〕金文京等編，《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第二輯）》，冊 29，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年。
- 〔明〕佚名編，《雜劇十段錦》，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紹陶室刻本。
- 〔明〕秦淮居士，《折桂記》（京都大學文學部藏明刊本）。
- 〔明〕顧梧芳，《尊前集》，國家圖書館藏明刊本。
- 〔清〕管廷芬，《海昌備志》，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道光二十七年（1847）尊經閣刻本。
-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笈》，上海：上海書店，2017 年。
- 中國戲劇出版社編，《王國維戲曲論文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 年。

- 王國維，《王靜安手錄詞曲書目》，四川省圖書館藏民國稿本。
- _____，《曲錄》，上海圖書館藏光緒三十四年（1908）玉海堂抄本。
- _____，《唐五代二十家詞輯》，四川省圖書館藏光緒三十四年（1908）王國維稿本。
- _____，《曲錄序言》，《曲錄》，宣統元年（1909）三月稿本。
- _____，《曲錄》，收入沈宗畸編，《晨風閣叢書》，北京：中國書店，2010年。
- _____，《人間詞話·手稿》，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
- 王國維撰，徐德明整理，《詞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
- 王國維撰，葉長海導讀，《宋元戲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 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編，《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目錄（史部·上冊）》，北京：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1938年鉛印本。
- 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編，《國學論叢》第1卷第3號，民國十七年（1928）年4月。
- 江瀚著，鄭園整理，《江瀚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年。
- 李一氓編，《一氓題跋》，北京：三聯書店，1981年。
- 沈宗畸編，《晨風閣叢書》，日本關西大學藏宣統元年（1909）刻本。
- 周越然，《吳興周氏言言齋藏曲目》，上海圖書館藏陸萼庭1950年鈔本。
- 房鑫亮編，《王國維書信日記》，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
- 孫殿起，《琉璃廠小志》，上海：上海書店，2011年。
- 馬奔騰編，《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
- 張本義主編，《羅雪堂合集：日記自傳家譜書信·第七函》，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
-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上海：新新書店，1930年。

- 陳乃乾，〈《曲錄》校補〉，《鑒賞週刊》第6版，1925年8月3日。
- 劉承幹，《求恕齋日記（全十八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
-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編，《容庚藏名人尺牘》，海口：南方出版社，2015年。
- 錢伯城、郭群一整理，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 繆荃孫著，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
- 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
- 羅振玉、王國維編，《續匯刻書目》，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連平范氏雙魚堂（1915）刊本。
- 羅振玉、王國維編，《羅氏藏書目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 羅繼祖主編，《羅振玉學術論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南京：南京勝利出版社，1947年。
- 觀堂遺書刊行會，《海寧王忠愍公遺書》，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天津羅氏貽安堂（1928）刻本。
- 〔日〕田中慶太郎編，〔日〕高田時雄、劉玉才整理，《文求堂書目》，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

二、近人論著

- 丁小明、陸豐川編，《雪堂雅集：羅振玉、王國維的學術世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杭州：西泠印社，2018年。
- 王慶祥、蕭立文校注，長春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羅振玉王

- 國維往來書信》，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
- 王鋼，《錄鬼簿校訂》，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
- 余筠珺，〈王國維早期研治詞學歷程考述——兼論東洋文庫所藏鈔校本詞籍之價值〉，《臺大中文學報》第60期，2018年3月，頁147-191。
- 吳澤主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輯1，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
- _____，《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輯2，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
- _____，《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輯3，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
- 李家橋，〈王國維抄校《錄鬼簿》考〉，《文獻》2021年第2期，2021年6月，頁152-166。
- 俞為民、孫蓉蓉編，《歷代曲話彙編·近代編》，合肥：黃山書社，2010年。
- 姜亞莎主編，《中國早期國學期刊彙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製中心，2007年。
- 施鵬存，《南唐二主詞敘論》，收入《中華文史論叢》1980年輯3，頁61-78。
- 柳向春，〈吳興徐森玉先生年表〉，收入陳燮君、陳克倫主編，《徐森玉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年，頁177-214。
- 孫楷第，《元曲家考略·錄鬼簿（批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
- 張禹，《王國維校《錄鬼簿》考》，廣州：中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 梁帥，〈王國維《曲錄》考論〉，《臺大中文學報》第73期，2021年6月，頁177-228。

- _____，〈新見王國維手抄詞書三種考論〉，收入《詞學(第47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頁248-267。
- 許姬傳，《七十年見聞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陳鴻祥，〈《人間校詞筭記十三種》零札〉，《文教資料》1989年第1期，1989年1月，頁37-48。
- _____，《王國維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19年。
- 彭玉平，《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 黃仕忠，〈從森槐南、幸田露伴到王國維：日本明治時期的中國戲曲研究〉，《戲劇研究》第4期，2009年7月，頁155-194。
- _____，《日藏中國戲曲文獻綜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 _____，《海內外中國戲劇史家自選集·黃仕忠卷》，鄭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
- 黃仕忠、徐巧越，〈王國維所編《羅振玉藏書目錄》原本及羅王互贈藏書考〉，《文獻》2019年第5期，2019年10月，頁181-191。
- 葉笑雪，《《徐森玉年譜》手稿》，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 鄭振鐸，《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羅振常，《蟬隱廬新版書目》，民國十九年(1930)鉛印本第五期，收入徐蜀、宋安莉編，《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
- _____，《蟬隱廬舊本書目》第16期，民國十七年(1928)鉛印本，收入徐蜀、宋安莉編，《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冊27。
- _____，《蟬隱廬舊本書目》第20期，民國十九年(1930)鉛印本，收入徐蜀、宋安莉編，《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冊27。
- 〔日〕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The Scholarly Relationship between Wang Guowei and Luo Zhenyu over the Study of *Ci* and *Qu*

Shuai Liang*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scholarship, the academic connection between Wang Guowei and Luo Zhenyu is believed to have started from their shared interest in stone inscriptions and oracle bones. However, it was actually the study of *ci* 詞 and *qu* 曲 that sparked their academic relationship.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Luo Zhenyu not only lent his collection of *ci* and *qu* to Wang Guowei, but he also tried his best to help get Wang's studies published. After their arrival in Japan, Wang gradually became interested in other issues; however, Luo still often spoke with Wang about textual editions, historical facts regarding authors, and other issues related to *ci* and *qu*. He moreover often consulted Wang before publishing books on these topics. In addition, Wang lent his bibliography on *ci* and *qu* to Luo, who compiled it into the catalog of the Dayun library. After Wang's death, Luo Zhenyu and Luo Zhenchang sold his collections to collectors at home and abroad in batches, so as to fully compensate the Wang family. It is argued here that shedding light on how Luo Zhenyu and Wang Guowei advanced the study of *ci* and *qu*, clarifying their academic relationship, investig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Wang

*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Guowei's research, and also exploring the scholarly ec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are of great scholarly significance.

Key words: Wang Guowei, Luo Zhenyu, the collation of *ci* and *qu*, scholarly publications, academic connections, Wang Guowei's collection of *ci* and *qu*

